

社論新國中

書叢期時常非

# 業事版出之期時常非

若 溟 金 者 著

榮宗馬震雷 編主  
詔鴻羅樵逸徐

行印局書華中海上

標商冊註



中國新論社

非常時期叢書

# 非常時期之出版事業

著者 金 溟 若

主編 雷 震 馬 宗 榮  
徐 逸 樵 羅 鴻 詔

上海中華書局印行

民國二十六年五月印刷  
民國二十六年五月發行

非常時期  
期叢書

非常時期之出版事業(全一冊)

◎ 實價國幣二角五分

(郵運匯費另加)



著者 金 溟 若

主編者 雷 震 馬宗榮  
徐逸樵 羅鴻詔

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代表人 路錫三

印刷者 上海 中華書局印刷所  
海 澳 門 路

總發行處 上海福州路 中華書局發行所

分發行處 各埠 中華書局

(本書校對者萬迪儒 柳啓新) (一四三三五)

## 總序

我國自鴉片戰爭以還，國步艱難，日甚一日，九十餘年間所喪失之土地主權，已令人痛心疾首，而近年以來有更甚焉；四省淪亡，冀察危殆，華北風雲，變幻未已。此何時乎？非非常時期耶！我國疆域雖大，能禁蠶食幾時！故稍知國是者，咸覺國族滅亡之禍，迫於眉睫矣。

故吾人不能坐而待斃，敵人以全力來侵，吾人當以全力抵抗；敵人爲繁榮其生命而魚肉吾民，吾人必爲生存而奮鬥；驅逐敵人於國境之外，俾吾國四千餘年光榮之歷史不自今日而絕。

而欲達此目的，則必全國上下，共同努力，以赴國難。本社同人有鑑於此，爰本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之義，有非常時期小叢書之編纂。其要點有三，略述之如左：

- (一) 介紹古人處非常時期之嘉言懿行，以喚起民衆之民族意識及抗戰精神。
- (二) 闡明非常時期之農工商人、教師、學生、婦女等應盡之職責，俾全國民衆知所以救亡圖存之道。

(三) 發表對於非常時期之政治、經濟、金融、食糧、實業、教育、民衆訓練、精神訓練、新聞事業、出

版事業、文藝等之意見，以供當局應付非常時期之參考。

惟本社同人學識有限，且此項小叢書之編輯在國內尚屬創舉，乏鴻篇巨著以供參考，故內容甚感淺薄，不足以當大雅之一顧，不過欲借以拋磚引玉云耳。是爲序。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月十日 中國新論社同人謹識

# 非常時期之出版事業目次

## 總序

一 總論·····	一
(一) 出版事業之意義與使命·····	一
(二) 出版物之種類與性質·····	六
(三) 出版事業之提攜者·····	六
二 出版物之社會的價值·····	三
(一) 出版物與新文化運動·····	三
(二) 出版物檢查制度之研究·····	三
1. 出版檢查之意義·····	三
2. 出版檢查之性質與範圍·····	三
3. 各國出版檢查制度之檢視·····	六

4. 我國之出版檢查……………三七

5. 非常時期之出版檢查……………四〇

### 三 出版事業之動向……………四三

#### (一) 各國出版事業之趨勢……………四三

1. 蘇聯之出版事業……………四四

(A) 蘇聯之出版概況……………四四

(B) 蘇聯之新聞事業……………四六

2. 日本之出版事業……………五一

(A) 日本出版界之近況……………五一

(B) 日本之新聞事業……………五二

3. 國社黨統制下之德國出版界……………五〇

#### (二) 吾國出版事業之趨勢……………四六

1. 中國出版界概況……………四六



(A) 新書業之勃興·····	四
(B) 出版界之黃金時代·····	六
(C) 出版事業之衰落·····	六
(D) 最近之出版界·····	六
2. 中國新聞事業之史的進展·····	六
四 非常時期出版業者應有之態度與決心·····	三
(一) 非常時期之出版界·····	三
(二) 非常時期之新聞事業·····	六



# 非常時期之出版事業

## 一 總論

### (一) 出版事業之意義與使命

出版事業是傳播文化學術的樞紐，出版物是人類文化的表現；故估計出版事業的狀況，得以衡量民族文化的高下。蓋出版物是比較具體的，可以估計的實物，其他如教育的程度，學者名人的多寡，雖然也可以藉考試等方法準繩之，但終難究其高深。世界各國對於出版物皆有精確統計，獨我國無之。各書局，出版社雖各有出版目錄彙編之類行世，但不是限於局部，則拘於一時，欲求整個有系統的精密之統計，在著者淺狹的讀書視野內，却未嘗看見。最近亦有倣效歐美日本之出版年鑑等雜誌而編纂『全國總目錄』或『出版周刊』者，對於讀書界誠然便利不少。但這類雜誌關於出版界之情形或趨勢，諸付闕如，仍舊脫不了普通圖書目錄的範疇，或負着營業上廣告的性質，於出版事業的推進上，則無多大裨益。於此可見我國文化落後，不可不說是國

家的恥辱。

出版物既然是文化的利器，出版事業就是人類承先啓後推進文化的主要工作了。民族的力量基於知識，今日中國民族的衰弱不振，並不僅是政治經濟，軍事力量的够不上他人，基本的原因，還是由於智識的落後；所以我認為促進文化的主要動力之出版事業，倒是今日中國所謂『文化建設』的基礎工作。

中國的出版物然雖缺乏統計，但質量未嘗不豐：貧儒著述，富室叢刊，官廳文件，社團撰集，各有印刷之品。而且形成出版物之各種要素，如造紙、印刷等事業，沒有一件不是創於我國而流播歐洲的。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卡德（Thomas Francis Carter）嘗著中國印刷業之發明及其傳入歐洲考（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and its Spread Westward）一書，謂造紙與印刷術，為中國發明物之影響於歐亞文化最深者。又克倫涅爾（W. J. Clennell）所著中國宗教發達史，亦稱造紙、印刷術、火藥、指南針為中國之四大發明。由此，可以推知我們先人對於文化事業曾有莫大努力，且已獲得相當成績，而後人不肖，不知積極改進，反讓學我者居我之先，這是多麼痛心的一件事情呀！

古代的人類，人與人之間意志的溝通，思想的傳遞和交換，僅賴言語爲媒介之工具。後來人類傳播的地域漸廣，間隔的時代漸遠，逾時逾地，不能僅靠着一出口便消滅的言語來傳達意志，乃有爲言語之代表的文字出現，以彌補這種遺憾。但僅有文字而沒有記載的工具，仍難爲功。古代記載文字的工具，有的刻於石上，有的刻於竹簡上，有的刻於木片上，有的雕在獸骨或龜甲上，有的鑄造在鐘鼎彝器上；如中國古代帝王的封禪文，刻於泰山石上，有七十二種不同的文字；巴比倫最早的文字，也刻在石碣上；希伯萊民族所傳的摩西十誡，也刻在一座小山上的。考古學上最有名的發現，如晉時出土的汲冢羣書，是刻在木簡上的；近代西域所發現的流沙墮簡，是刻在木片上的；清末河南洹河殷墟上所發見的卜辭，就是雕刻在獸骨和龜甲上的商代文字；至於鐘鼎彝器，則自周以下，更代有出土了。然我國古代最流行的記載文字之法，爲篆於竹簡，所以我國書冊的『冊』字，篆文作『𠄎』，乃象竹簡成匝的形狀而成。此外與書籍有關的『簡』『策』『篇』『籍』等字，都從竹頭，從文字源流上考之，可見竹在記載工具上，是占着多麼重要的地位了。又如文學上所常見的詞彙，有『殺青』『汗青』『青史』等辭，原始的本義也是從竹簡上來的。我們稱一種著作完成或一書出版曰『殺青』，這就是因古代書於竹簡，一書之成勢必斬竹，故

稱「殺青」或曰「汗青」則因斬竹之後須加煮瀝，使其發汗平滑可書，故有此稱。而歷史書於竹簡，遂轉稱「青史」。

不過所謂竹簡，起先以刀錐一類刻成，後來改用漆書，秦時復廢竹木而代以縑帛，也就便利得多了。時代漸進，人事日繁，需要文字也更爲迫切，他們覺得縑貴簡重，刀刻費時，漆書不便，時時想所以改良的方法。周時，刑夷造墨，秦時，蒙恬造筆，後漢宦官蔡倫以意造紙，史稱莫不從用。文字記載的工具，於是有了不少進步。可是雕版印刷的時代，尙不啻有霄壤之別，相差甚遠。

史載我國雕版印刷術之創始，爲隋文帝開皇年間，恰當公元五三二年的時候。至於印刷術之由官府出面推行，史有可考者，則自五代始。據五代史所載：『後唐明宗長興三年，宰相馮道、李愚請令判國子監田敏校正九經，刻版印賣。』這件工作繼續不斷地進行，歷後唐、後晉、後漢、後周四朝，唐明宗、後帝、晉高祖、出帝、漢高祖、隱帝、周太祖凡七主，費時二十餘年，至公元九五三年，纔將九經的木版完全雕成，印成書本頒行全國，不可不說是一件偉大的工作。而這位馮道，就是後人所奉爲印刷術始祖的『長樂老』，他所推行的雕版，也就是出版事業之創始了。

至於活字印書法，則創於宋初，爲慶曆中布衣畢昇所發明。及至元朝，又有一位王楨出來，革

新排版；再降至明世，無錫蘭雪堂華氏，名燧字文輝，始用活字銅版印書。於是，我國印刷術規模粗備，出版事業乃漸暢盛，本來很可以乘此機會精益求精，力圖改進的，奈後人中沒有目光遠大的人物出現，遂形成停頓的狀態了。循至清末，海禁開放，海外交通發達，耶穌教徒來華傳道以後，西洋新印刷術也隨同新舊約聖書傳入吾國，以致發明印刷術的中國人，反不得不仰面請教他人了。

按歐洲活字印刷的發明者，爲德人戈騰堡（Johann Gensfleisch Gutenberg 1400—68），而他的印刷術，事實上是受十五世紀時由中國傳入歐洲的印刷術之影響，迭加改進罷了。我國之轉做歐洲新印刷術，雖爲近數十年間事，若溯其源，則遠在十九世紀初葉。而我國初期之活版鉛印，多爲西教士所經營，不過用作耶穌教的宣傳工具而已。迨上海申報館及商務印書館創業伊始，纔把這種新印刷術運用於推進學術文化的真正意味之出版事業，數十年來迭次改革，五四運動以來，新文化的機運開啓；從運動的策源地之故都北平，一直向南推動，波及於全國，刊行新文化的出版物之小書店，小報館，宛如雨後的春筍一般，此起彼伏，而推進文化的原動力之出版事業，也就日見昌盛了。

中國自有鈔錄而雕版，而印刷出版，其經過情形略如上述。按當初馮道之借政府的力量推行印刷，提倡出版事業，其初意未必存心鼓吹文化事業，不過本着一般儒生尊經衛道的見解，利用當世新發明的雕版印書法，做這一番工作，好在歷史上留下一個有功聖教的紀念。然而他這偶然的動機，却於無意中把這有功文化的事業，作登高一呼的提倡，好像一星火種，從五代這昏黑的深夜，從骯髒的灰燼中爆發出來，漸漸的蔓延擴大，竟成爲光焰萬丈的火炬，照耀於四方。

如上所述，出版事業既然關係着民族的存歿和國家的興亡，且把握着人類進化的總紐，其意義之深刻，其使命之偉大，不言可知。那麼，與這重要的出版事業直接或間接有關係的一切人物，就是參預這偉大工作的人們，更不可稍存懈怠之心。直接參預出版事業，即與出版物關係最密切的人們，第一當然是出版業者，其次爲編輯者，再次爲著作者。此外，如經售書籍的小商人，代辦雜誌、新聞的代辦所，發行學術書籍的學術團體，圖書館的經營者，印刷業者，造紙業者，以及在出版事業中占次要地位的校讎者，印刷工人，製版工人，鑄字工人等，也與出版事業各有相當的關係。以上所枚舉的各種人們，對於出版事業假如沒有準確的認識，而竟欲出版事業有正常的成長，無異緣木求魚，當然是難能實現的。



本書在「非常時期之出版事業」這標題之下，敘述出版事業在非常時期應有如何決心，應取如何態度，爲本書執筆之標的。現今顯然是一個動亂劇變的時代，各國政局都呈着混亂不安的現象，各帝國主義者利害的衝突，已尖銳達白熱化的程度，隨時有引起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可能。至於貧弱不堪的中國，外有強隣壓境，愈演愈凶，內有天災人禍，不可終日，我們所處的這個環境，正是非常時期之最尖端，如何救亡圖存，確是一個緊迫待決的問題。然而所謂非常時期，當然是對平常時期而言的相對名稱；有了平常時期所播的惡因，纔產生出非常時期這惡果來的。可是，若要闡明從那一個時期到那一個時期爲平常時期，從那一年起我們的國家纔墜入了非常時期，欲予以判然的分別，事實上是比抽刀斷水更難做到的一件事情，就民族的立場而論，自從明末，吳三桂用方獻廷之策，乞師於清攝政王多爾袞，開門揖盜以來，中國的非常時期已陷於極嚴重的狀態，一直沒有方法排除的了。民國光復之初，表面上雖很有打開非常局面而轉向平常時之可能性，但事實上並不如此，軍閥的跋扈，列強的威脅，國家的危機愈加急迫，反引起更嚴重，更尖銳的非常局面了。時至今日，情勢的嚴重已至一觸即發，有急轉直下，由非常時期而趨進戰時的可能性的了。處在這非常時期尖端上的我們出版界，是不是有足以應付非常時期的相當

準備之必要呢？我們爲適應這非常時期的需要，實有闡明整個出版事業之意義，回顧出版界過去的情況之必要，然後，纔能決定今後我們所應循從之大道。

## (一) 出版物之種類與性質

我們普通所謂出版，就常識的概念而言，印刷三百頁或四百頁的書籍而製本發行者，稱爲出版業者，亦稱出版家。但事實上，不僅發行單行本的纔能配稱出版事業，其他如發刊雜誌的雜誌社，發刊新聞紙的新聞社，印行地圖、掛圖的輿圖社，專印叢書、全集等預約本的出版社，代辦雜誌、報章的代辦所，總括而言，皆爲出版事業之一種；從事這些事業的人們，皆得稱爲出版業者或出版家。再就出版物的本身而論，有學術書，有文藝書，有教科書，又有所謂兒童讀物，民衆讀物，青年讀物等，其種類和性質，實在多歧而不勝枚舉的。所以我們平素所稱「出版」兩字，其範圍極爲廣泛，若要一一予以詳細的說明，決非這樣的小冊子所能做到，這裏僅能將其大概區別，作簡單的敘述而已。

茲爲便於說明，將出版物的種類和性質，分爲縱的區別與橫的區別，從兩方面分別說明於

下：

### 1. 縱的區別

預約本 單行本 定期刊物 新聞紙 畫報 叢書 辭典

### 2. 橫的區別

學術書籍 文藝書 教科書 兒童讀物 大眾讀物 青年讀物

以上所舉，僅其大概的區別而已。可是不論縱的或橫的，並不是對於同一出版物各予以縱、橫兩方面不同的觀察，不過僅就出版物的性質與讀書界的性質，加以區別罷了。例如單行本中，既有學術書籍，亦有純文藝書或教科書，而且有專給兒童閱讀的兒童讀物，又有適應民衆的需要而寫之民衆讀物，或爲青年學生而執筆之青年讀物，種類繁多，遽難斷定。又如辭典，有法律辭典，有經濟辭典，有教育辭典，文藝辭典，動物辭典……等；此外如預約本，定期刊物，畫報等亦莫不如此，皆可類推。現在把上面所舉各條，擇其重要者再作進一步的說明罷。

**預約本** 包括全集、文庫、講座之類，於半年或一年這一定的期間內刊行若干一定數量的出版物，每月一冊或每月二冊，按出書的順序送到讀者手中，全部六冊，十二冊，或數十冊，在一個

系統之下發刊完整的集成書籍之謂。預約本可大別爲二：一爲全集；二爲講座。現在所謂預約本，大體上似乎都指全集而言，其實以講座的形式而出書者，近來也時有所見，故仍加以分別爲是。

(1)全集 如中華書局的古今圖書集成，四部備要；商務印書館的四庫全書珍本，叢書集成；開明書店的二十五史等，都屬於全集之一種。『預約本』三字，如字面上所表示的樣子，是預先約定的意思；所以有預約金的規定。這種預約本的方法，本來是日本的出版業者所創始，以大正十五年（即民國十五年）改造社的現代日本文學全集爲嚆矢，後來日本各書店皆起而效尤，遂風行一時。日本預約全集的辦法，大概收會費之一月份爲預約金，以之抵充最後一月之會費。例如每月發行定價一元之書籍一冊，每月會費即定爲一元，若再加預約金一月份，第一個月便須繳費大洋二元，會費二元者則須繳四元，四元者繳八元，以此類推；但這樣一來，讀者的負擔仍嫌過於重大，故日本現今的預約本，除少數特殊的東西外，大概都免收預約金了。預約本創始的初意，一方面出版業者固然是爲自己的利益打算，但一方面未始不可以說是謀讀者的便利，蓋由此亦可減輕貧儒或苦學生的負擔，不必一時拿出一批巨款，得以分期零星繳納，而能獲得完整的巨著，於出版事業的推進上，倒有相當功績。至於預約本爲什麼徵收預約金呢？這理由非常

簡單，可說完全是出版業者對於自己的保障，爲自己的利益而規定的。現在假定某一預約本有十萬部的預約者，則至最後一冊出書的期間內，出版業者便能夠無利息而享用十萬元的巨款，他們可不是能用這一批錢來企業另一種事業了嗎？而且對於中途解約者的預約金是規定不退還的，茲假定有一萬人中途解約者出現的話，出版業者就可以白得這一萬元的預約金了。此外還有一層更重要的理由，即爲預防中途解約者之故；蓋就出版家而言，與其沒收一萬元的預約金，毋寧希望各預約者皆能夠繼續到最後爲愈的。若假定全部照預約進行，每部可以獲利百元的話，一萬人就有一百萬元的利潤了。所以預約金的最大目的，可說是在於維持預約者繼續到底，使他們全始全終的一種商策。這在預約本創始當時，出版界和讀書界雖曾各照此辦法進行，但到後來，隨預約本的昌盛，竟有不收預約金或自由選購的通融辦法出現了。本來預約本的性质，是受一定的讀者之約定而印刷製本的，表面上似乎不會有可以分售的餘額，可是事實上却又不然，大概印刷時都在預約數之外多印幾部以作預備，且又有中途解約者的部數多餘出來，零售分賣的變通辦法，大概就是因這種原因而流行的。如商務印書館所發行之國學基本叢書等，即其一例。這在讀者，既能隨意選買己所欲購的部分而不必勉強接受己所不欲之物，也

許非常稱便，但在出版業者方面，銷路暢旺的本子雖能再版、三版，乃至十餘版陸續添印，但銷路窒礙者，勢非束之高閣，堆積於倉庫中而一無用處不可。然就整個出版界而言，由此可見預約的風潮漸漸減退，慢慢的又回到單行本的原路來了。

上面所述預約本的辦法，乃根據日本出版界的情形而言。至於我國，似乎略有不同。我國預約本之做日本出版業者之分期繳款，按月出書的方法，當推商務印書館之四庫全書為最早，後來出版家認為這種方法於自己很有利益，乃羣起效尤。於是，遂難免有投機分子從中取事，不能按預定之期出書，而把向預約者徵收所得的預約金和會費完全移作他用，借此挽救營業的危機，打破不景氣之難關者，頗不乏人。日本政府為保障讀者利益起見，為預防不正當的出版家向讀者騙取預約金，曾頒布預約出版法，對於凡欲發行預約而徵收預約金者，須經過警視廳（即公安局）之手預存日金一千圓於正金銀行，然後纔允許進行預約。這種辦法，倒是頗切需要的。

一方面我國的預約辦法，與其說謀讀者之便利，倒不如說完全是出版業者為自己利益着想的純商策。按中國預約書繳款規定，按月繳納會費之辦法殆未曾有，大抵皆分為三期或四期，甚至有於預約時全數繳清者。這樣，讀者的負擔並無減輕，貧儒或苦學生之流，對於部數繁重，價

值巨大之書籍，依然沒有購買的力量，唯有望洋興嘆而已；雖預約本之初意，似乎很遠了。

(2) 講座 與全集的刊行方法，完全相同。其稍異之點，爲與全集之將全文歸納於一處，形成單行本之連鎖的方法不同，而採取講義體裁。其法：每科目不在一冊之中完全結束，每冊中輯載數科目；例如『世界文化史』一科在第一冊中載至五十六頁，五十七頁以下至終結，載在第二冊，或間隔一月載在第三冊，或分載於第二、第三、或第三、第四冊，其方法略與雜誌連載相似。這對於讀者也許有若干不便當的箇處，但在出版業者方面，亦可爲防止中途解約之一方法。我國的預約本，泰半採取全集的體裁，這種講座式的很少，生活書店所發行的世界文庫，本來是屬於講座一類的唯一之預約本，但最近也改成全集的樣式了。大概是因爲這種方法，不適合於中國人的讀書趣味之故罷。

**單行本** 適與預約本之二冊以上形成一部者相反，如『世界文化史』然，僅一冊獨立完成一書的出版物之謂。若同係世界文化史而分釘爲上中下三冊的時候，通常均預約發行者居多，所以不能稱爲單行本，應歸入預約本的部門。至於辭典或教科書之類，雖係單獨一冊，也但不能稱爲單行本，應從辭典或教科書等各該部類的名稱。要之，單行本爲不在總稱的名稱之下僅

一冊獨立發行的出版物之謂。就出版業者而言，預約本一旦發表，不論應募的預約人數怎樣少，出版家亦須有履行其計劃之義務，非刊行至最後一冊不可；單行本則不然，可照自己的意思任意取捨，可視出版物之成績如何，能逐次改變其方針。例如刊行學術書籍而覺得成績不佳，銷路阻滯的時候，隨時能够停止出版，轉換目標，或改出文藝書籍，或將目光掉向兒童讀物等，隨意之所欲，可以自由操縱。或於滿洲事變發生之後，或於意阿戰爭勃發之初，或乘西班牙暴動之際，均可適應時代的要求，窺探讀書界的心理，與新聞雜誌調整步伐，發刊對於各該事件之研究或專著，乘時代的潮流操縱商策，往往可以獲得數十版瞬息售罄之盛況。這與上海交易所中競爭激烈的公債或股票的買賣一般，若確定其目標，運用男性的頭腦進行事業，實有一種特別的工作上之愉快。這種無拘無束的自由趣向，可說是單行本的獨特之風味罷。

**定期刊物** 即指雜誌而言。預約本雖也於每月或隔月定期刊行，固然也是定期的刊物，但或稱全集，或稱講座，各有一定的名稱，所以不能稱為定期刊物。所謂定期刊物之雜誌，其內容的性質和種類也很複雜：有純文藝性質的文學雜誌，有專載電影消息與研究之電影雜誌，有以婦女為對象之婦女雜誌，亦有以學生為讀者的學生雜誌，或應一般民衆之需求而編輯之大眾雜



誌等，其性質、目的，實不遑枚舉。也有專載本店之圖書目錄，傍及出版之消息等類完全廣告性質的刊物，雖有三分、五分的定價，但並不着重售價，而以店中的其他書籍之推銷為目的。再就出版法而言，定期刊物又可區別為二：（甲）根據普通出版法而發行者；（乙）根據新聞紙法而發行者。前者以掲載學術、文藝的文字為限，後者則與新聞紙一樣，得能登載時事問題，例如政治的記事或社會的消息等。

**新聞紙** 也是出版之一種，雖然是特種的東西，但既然屬於出版事業，當然不能歧視。新聞紙是由記者編撰原稿，製版印刷，然後送到讀者的眼中的。新聞紙以消息靈敏而正確和立論嚴整為最重要，且需要敏捷的活動。所以記者的頭腦清晰，觀察力犀利，手腕靈活等固然於新聞事業之盛興有莫大關係，但如機器，也需要超高速輪轉機，故第一流之報館，往往自傲印刷機之精而且多，為宣傳之口實。

**畫報** 視其內容的性質而有許多種類，如滑稽畫報，時事畫報，科學畫報……等；總之，以漫畫、照片等替代或補助文字的出版物，皆屬於這一部門。而且畫報大抵都定期出版，或為旬刊，或為週刊，有時且為新聞之副刊。

**叢書** 可說是單行本的集成，乃將單行本中性質相同的書籍，分門別類歸成一處，而稱某某叢書，或稱某某叢刊。如商務印書館之科學叢書，大學叢書；中華書局之新文化叢書，教育叢書等，都屬於這一部門。又如一個學術團體所出版者，亦稱叢書：如中華學藝社所發行之學藝叢書，少年中國學會所輯之少年中國學會叢書等是。此與前者不同，不一定要內容性質相同，而以一團體爲單位；如中華學藝社之學藝彙刊中，有教育書，有哲學書，有法律，地質，音樂，電學……等書，宛如一個百貨商店一般，無所不有。此外又有出版業者或學術團體，應時代之需求，出版一種特殊的叢書，特約各該方面的著作者分別擔任編撰，限定冊數和時間，完成一部叢書以滿足讀者之需要：如商務印書館最近發行的一九三五年世界概況叢書，中華書局的東北小叢書，國民外交小叢書及中國新論社所主編的這非常時期叢書，都屬於這一類的東西。這樣特約撰稿，限定冊數和時間出版的叢書，大抵以預約發售者居多數，這種場合，當然同時也可歸入於預約本的部門了。

**辭典** 大概是沒有什麼人不知道的吧。如英華詞典，百科辭典，辭源，康熙字典之類，大抵的讀者都有一冊或兩冊擺在案頭以備不時之需的，沒有敘述解釋之必要。

以上把出版物縱的區別作了簡單的說明，至於橫的區別，如字面上所已表示的樣子，無說明之必要。但前面所示學術書、文藝書、教科書、兒童讀物、大衆讀物、青年讀物六部門，不過僅係極廣泛的區別而已。如學術一門，有法律、美術、經濟、工藝、思想、宗教、文學理論、歷史、理學、動植物、礦物、工業、醫學、農業等，更可細列爲許多部門。而且再就其所區別的細部而論，如法律一類，又有商法、民法、刑法或國際法等各該專門書籍，而辭典式的東西，當然也算在其內的。又如文藝書，則包括小說、劇本、詩歌等純文藝之各種作品。至於教科書，一般的是指中學、小學的教科書之謂，高等專門以上，一部分雖也可以稱爲教科書，但大部分在學校中聽講時僅抄錄教授的筆記，回家自修時始參閱各該科目之書籍，所以一般的稱爲參考書而與教科書有別。兒童讀物，在吾國從來是被等閒視的，但近來對這方面亦認識其重要性，專以兒童爲對象的出版物，也相當的流行起來了。大衆讀物與青年讀物，如其字面所示，沒有解釋的必要；青年兩字，含蓄着青年學生的意思，却不可不知道。

總之，這裏所謂縱的區別，蓋就出版物的形態，即外的——出版物的種類之區別；所謂橫的區別，乃就出版物的精神的，即內的——出版物內容的性質之區別。居住在大都會的讀者，到就

近的大書店裏去參觀一下，這橫的區別便不難在它們發賣的書架上得到明白的解釋。

### (二) 出版事業之提攜者

我這裏所謂出版事業的提攜者，不僅指書籍商而言；直接從事出版事業的書店老闆，編輯者，著作者，固然是出版事業的中心人物，但此外如學術團體，圖書館，書籍雜誌之代辦所，以至於讀者們，凡與出版物稍有關係的人們，可說都是出版事業的提攜者。可是出版事業的提攜者，其範圍既然這樣廣泛，倘欲對於這許多人們一加以研討，決非本書這樣小冊子所能做到，所以下面仍舊只能擇其中與出版事業關係最密切的中心人物作概要的說明，其餘僅能這樣提其名稱，而使讀者諸君知道出版事業的提攜者並不限於這幾個中心人物，此外尚有許多人們躲在出版事業的幕後，也一樣的演着重要的角色。

**書籍商** 指小書店的老闆，大書店的總經理、出版部長、編輯部長、廣告部長、營業部長等，一切直接從事出版事業的人們之謂。書籍商既稱曰「商」，當然以營利為其最大目的。所以他們的出版與官廳的出版工作不同，不能僅靠一個編輯科，既有營業部，又有宣傳部，各適應其職分

而活動，而且務須分工合作，在各部的意見一致之下，以決定出版物之動向。不論特約的稿件或外來的投稿，經編輯者審閱的結果，原稿本身已無問題而交到經理的手中時，乃於各部協議之下，慎重地考慮該書出版後之銷路，審其利潤能否達到營業之目的。這時，便是經理者顯示其才幹的機會來了。出版之利潤，其最要條件為銷路的暢旺，於是經營者須有犀利的眼光以洞察時代的潮流，尤需要銳敏的頭腦，以把握讀者的心理。然而僅僅這樣，還不能說是十全的出版業者，蓋因出版事業雖屬於商業之一種，但於商業之外，在他們的雙肩上又負着文化的重責，故營業之目的多賣多利更非與出版而有益於社會這條條件相一致不可。因此，出版商於商業的手腕之外，更需要清晰的腦筋，高尚的人格，以完成他對文化的使命；這點是出版商的特點，也就是他們與普通商人的差異之處。這一層在吾國，似乎往往被忽略了，不學無術的市儈竟來從事出版事業，一面却做他投機事業的迷夢，投機虧蝕的結果，遂不得不借出版來彌補，把投機的手段運用於出版界，於是翻印他人的著作或濫出迎合低級社會之低趣味讀物，便充斥於市塵了。這樣一來，負着推進文化的使命之出版事業，不僅不能完成他們的職責，反而變成摧殘文化的叛徒了。

**編輯者** 可說是書籍商的代表，是聯繫出版業者與作者的中間人物，他們的一舉一動所及於出版事業之影響甚大。編輯者是活動於書籍商的雇傭之下的，所以他們的審閱稿件，當然不能僅在原稿本身的價值之下活用他的主觀，勢非顧到營業之目的，——卽利潤不可。意卽於原稿本身的價值以外，亦須揣測讀者的心理，非把該稿印刷出版後其銷路如何擺在腦海中，以定其取捨不可。編輯者所負文化之使命，實較諸書店老闆爲尤重大，把營業的目的置諸度外，固然是勢所不能，但一味討好書店老闆，仰承他們的意思，爲營業上的策略而搜羅低級趣味之稿件以求暢銷，却非大大的考慮不可的。

**著作者** 的種類甚多，也與出版物的性質類別一般，有爲各該專門而執筆之著者。而每類的著作家中，又可依其人之性質而區別之如下。其一爲純學者，大抵爲大學或專門學校的教授，將其每日在書齋或實驗室中研究所得的學問之一端傳授與學生，其研究之綜合便形成著作物交到出版業者的手中出版。這類學者，一般的皆疎於世事，終日蟄居於研究室中，沒頭於自己專門的學問，所以他們的研究論文，是具有相當權威的。其二爲世人普通所稱爲文人的人們，普通所謂文人，好像專指小說家，或指文學家而言，其實不然，要之執筆著撰的人們中，既非專門的

純學者，又無一定的職業，專恃文墨爲其生活之全部的人，其中雖有例外，但大抵皆可稱爲文人。其三爲實際家，如供職於大工廠的技師，或有工學博士等頭銜的公司中之董事或經理等，亦往往從事著述，他們的本職雖爲工廠或公司中之職務，但在出版界方面，却不得不把他們也列於著作者之例。此外若細細分別起來，當然還有許多類別，上列三種，不過大體上的區別罷了。又如報館的記者或通訊員，未始不可以歸入著作者之列，但既有特別的名稱，還是各從其特殊名稱爲是，然爲出版事業的提攜者之一員，則無疑義。

## 二 出版物之社會的價值

### (一) 出版物與新文化運動

出版事業與新文化運動不是背道而馳，乃是兩相扶翼着並道前進的。十八世紀的產業革命，雖然完成了近代資本制度，在全世界上造成不少血肉模糊的悲慘景象，但它所帶來的工業技術的進步，使十九世紀以前生產的量和製作的質都無怎樣驚人之進展的出版事業，有了劃時代的變革，而呈現突飛猛進的現象。如印刷術之改良，紙和墨油的生產量之增加，都是工業技術所賜與出版事業的恩物。再加以交通利器的發明，更使出版物得以普遍地流通，現在世界各國新聞紙，雜誌，書籍及其他出版物的激增，對於新文化的傳播，智識灌輸的功能，是誰也不能否認的事實。

出版物是宣傳思想，主義最有效的工具，在文化運動中演着主要的角色。當五四運動揭竿而起的時候，它所開創的中國新文化運動所恃為輔助之武器，就是出版物了。當時在陳獨秀先生指導之下的新青年雜誌，便是他們在社會思想革命方面的代表，揭起擁護德莫克拉西與賽



因斯（科學）的旗幟，反對舊藝術，舊宗教，舊文學和國粹，把秦漢以來悠久的孔子思想和家族主義的社會機構全盤打碎了。這樣，他們把西洋文化的精華，介紹到中國來了。他們對於新文化的功績，是值得我們敬仰的。

他們對舊思想挑戰的武器是什麼呢？他們是用出版物替代手鎗和炸彈，以到達他們破壞舊文化之目的。他們用什麼東西為介紹西洋新思想的工具呢？他們是用出版物來完成其積極建樹的工作的。於是五四運動以後，出版新文化書籍的小書店，宛如潮水一般氾濫，由運動的策源地——北平向南推移，滿佈於全中國。由此，可知新文化運動與出版事業之聯繫，兩者的關係密切，是相形益彰的。

## （二）出版物檢查制度之研究

### 1. 出版檢查之意義

出版物既是宣傳思想，主義的工具，際此各種思想和主義爭雄稱霸各占一方的時候，出版物便成爲他們鬥爭的武器了。同時國與國之間，也各利用出版物做輔助的武器，或用爲文化侵

略的工具，或借出版物以謠惑國際間的聽聞，一旦戰事勃發，更可以散發傳單煽惑敵方的士兵，或發刊新聞紙和小冊子誣讒敵方，或作於己有利之宣傳，結果每每能獲得莫大效果。至於黨派與黨派間的鬥爭，出版物尤為萬不可少的主要武器；或以之宣傳自己之主義、黨綱；或以之表明自黨的主張和對政局之態度，為吸收羣衆發揚黨派之工具；或以之駁斥反對黨之主義和綱領，作為攻擊的利器。於是國與國間或黨與黨間，對於出版物的存在便發生了兩面完全不同的矛盾現象：一方面因出版物可以幫助自己——鞏固或奪取政權，故認為於己有利；一方面因出版物同時亦可為敵方所利用，以之攻擊或推翻自己，故認為於己有害。在這種矛盾的情形之下，一個黨派權力掌握在手中的時候，一個國家在自己統治的範圍以內，便要盡量設法制止敵方的反思想，反宣傳之傳播了。這樣，出版檢查制度的應運而生，實為近代出版事業的矛盾現象中之必然結果，是毫不足奇的。

根據上述理由，出版檢查的意義，實為防禦和攻擊的兩種效果。所以世界上不論任何國家，不問其為資本主義，為法西主義，為社會主義，不拘其政策為帝國主義的政治，或民主政治，或獨裁政治，出版檢查制度是始終存在着的。縱然其形式——如施行之方法或措置的寬嚴，或稍有

不同，至於其意義和存在，則完全無異。

## 2. 出版檢查之性質與範圍

出版檢查的意義既如上述，其性質與範圍，則因時間和空間的不同，可區別之如下：

(A) 檢查的性質 分爲平時、非常時、戰時三種：

**平時檢查** 出版物平時檢查的對象，不外乎(甲)危害政府的，(乙)妨害治安的，(丙)敗壞風俗的，(丁)揭載軍事、政治、外交上不應發表之祕密文件的四種。如出版物中之文字，有觸犯上列之一者，須受政府當局之取締。

**非常時檢查** 較平時的出版檢查尤爲繁雜，而且更爲慎重。平時檢查中除(丙)敗壞風俗的一條，與非常時檢查的關係較爲疎淡外，其餘三條，不僅不可忽略，應該取更嚴重的態度。如軍事、外交、政治之文件，平時認爲無祕密之必要者，到了非常時期也務須加以特別的注意。此外如危害政府和妨害治安的文字是當然的了，即如足使民心渙散，減少民族意識，降低國民愛國心的文字，也在取締之列。

**戰時檢查** 非常時期尖銳化而達於戰爭時期，對於出版物的檢查也更嚴重得多了。其任務和方法，完全視戰爭的性質如何，然後決定；例如戰爭的目的，戰區的範圍，本國領土與敵方之距離，敵人的國民性，同盟國的關係，本國國民的利益……等，檢查人員在事前苟未認清，便不能完成他們的任務。充任檢查人員者，因此不但要有普通的檢查知識，並且需要有軍事知識，纔能權衡出版物的利害，決定是否應該取締。

以上三種檢查，第一種爲偏重對內，第二種爲內外並重，第三種則以對外爲主，而獲得防禦和攻擊兩種效果。

(B) **檢查的範圍** 出版物檢查的範圍，不僅書籍、新聞、雜誌等正式出版物而已，凡用文字印刷的東西，如傳單、招貼、通告……等，都在檢查之列。而且不僅此種文字印刷的東西爲然，此外圖畫、電影、無線電播音等，因其和出版物同樣的可以灌輸思想及智識給一般人，所以也認爲出版檢查的對象，而竟也歸於出版物檢查的範圍以內。茲擇其中主要的出版物，即書籍、新聞、雜誌三種，分別說明於下；其餘則僅順便及之，一概從略。

**書籍檢查** 書籍對於讀者之影響非常重大，而其永久性則凌駕其他一切出版物之上。出

版事業隨着工業技術之進步，今日所出版之書籍，質的方面既極複雜，量的方面又多得不計其數，所以檢查書籍，其工作非常繁重，通常都是分工的。譬如教科書的檢查，須審視其內容不違反現行政治，而且又要合於教育原理，故非專門教育家，則不能勝任；所以關於這類書籍，概由教育當局負責檢查。又如涉及黨義的一切著作，在黨治的國家中，爲了性質的不同，都歸於黨部檢查。行政當局所檢查者，僅一般普通的書籍而已。

**新聞檢查** 新聞紙之於近代人，其重要不減於每日的麵包；假如沒有了新聞紙，人們的精神生活上，便要感到飢荒了。由此可見新聞紙和人生的關係是如何密切了。新聞紙不但是供給新聞的機關，大而言之，簡直可說是社會教育的一個機關，對於人類的思想和生活，隨時可以發生很大的影響。利用得當，固然有很好的功績；反之，却也可以造下無窮的罪惡。人類的性情是流動的，最容易爲外物所移動，新聞紙是天天與讀者見面的東西，爲讀者接觸最多之出版物，耳濡目染的結果，讀者的思想和生活，最容易爲所左右。所以政府當局，對於具有這麼偉大力量的新聞紙之檢查，當然要非常重視了。平時政府若發現新聞中有危害治安，敗壞風俗，或誹謗名譽的文字，便由法院檢察官提起公訴，對新聞社予以法律的裁制。於是可以曉得新聞的檢查，在平時

一切均由司法機關負責，裁判則根據普通刑律的。至於非常時期或戰時，其辦法便不同了。

**雜誌檢查** 宣傳一種學說或主義，雜誌較任何出版物為最容易收效。蓋因雜誌在篇幅上較新聞可以容納多量的文字，較普通書籍則短小精悍，不致於冗長散漫，使讀者在閱讀時能聚精會神地看下去，在心中植下有系統的觀念。如果要鼓吹一種臨時的主張，利用新聞紙來煽動或挑撥雖能較雜誌容易得到效果，然而要想一種學說或主義深入人心，吸收羣衆，却非利用雜誌不可了。雜誌在傳播上雖不及新聞紙那麼迅速，廣大，普遍，但其重要性却無多大差別，所以對於雜誌之出版檢查，當然不肯輕易放過的。雜誌的檢查方法，有的是檢查付印前的稿件，有的是檢查發表後的文字；我國現在所採取的，大抵爲前一種方法。

除上述三種以外，電影檢查和無線電播音檢查也都是出版檢查中的主要對象，也不亞於書籍、新聞、雜誌三種，但非本書所敘的範圍，故一概從略。其他如地圖、照片、繪畫、傳單、招貼、通告以及戲院演出的劇本之類，也都要經過行政當局的檢查，由司法當局負取締的責任的。

### 3. 各國出版檢查制度之檢視

上面已經說過，出版檢查是一個國家或一個黨派爲欲獲得防禦和攻擊的效果纔應運而產生的，不拘任何國家，其方法和措置雖有不同，但重視出版檢查，則無差異。茲檢視世界各國的檢查制度，可知其一斑。

(A) 日本 資本主義各國間出版檢查之最嚴厲者，當首推日本爲第一。日本雖然與英國一樣，同爲君主立憲的國家，但英國人最尊重法律，在英國，任何人在法律上沒有特殊的地位，全國國民都以法律爲生活的準則，有與中國俗語所謂「國王犯法庶民同罪」的這樣俗語，可是日本便不然了，乃以天皇主義(Mikadoism)爲立國之基礎，而以忠君愛國爲他們的傳統思想，假如忠孝衝突的時候，寧可捨孝而盡忠。所以日本的出版檢查，有幾個世界其他各國所沒有的特點：第一，爲嚴厲取締冒瀆皇室尊嚴的——所謂不敬的出版物；第二，爲嚴厲取締有害國民道德根本之言論著作，所謂國民道德的根本，就是指忠孝二字；第三，爲嚴厲取締宣傳所謂「危險思想」的不穩出版物，共產黨所發行的小冊子和否認君主制度的作品，不消說是「危險思想」了，即如小市民對於當局的設施若稍有不滿的表示，也一樣的屬於「危險思想」的範疇之內的。上列三特點之外，日本對於新聞紙之檢查尤爲嚴厲；依據現行的新聞紙法的規定：凡發行新

聞紙者，須在地方官廳繳納保證金。保證的金額，規定如下：(甲)在東京市、大阪市及市外三里內之地，須繳納二千元；(乙)在人口七萬以上之市區，或市內一里以內之地，須繳納一千元；(丙)在其他地方發行，須繳納五百元；(丁)一個月發行三回以下者，僅繳納上項金額之半。新聞紙發行時，須分別呈送內務省（相當我國之內政部）一份，管轄地方官廳和地方法院檢查署，初級法院檢查署各一份。其他出版物，也與新聞紙一樣，出版法規定應由發行日至到達日之三日內，將書樣送呈內務省審查，違者即被處罰金。日本的違法出版物之處分權，歸於內務省大臣（即我國之內政部長），無論什麼出版物，預備禁止或查封時，地方官廳先要呈報內務大臣，纔可執行。出版物的違法裁判，日本與英國一樣，皆採取連坐法，即出版人、編輯人、印刷人、著作人、售賣人，都要負連帶責任；這和出版檢查之嚴厲，正可成一正比例。

(B) 意國 意大利既在法西斯蒂主義之下，實行着獨裁政治，當然不容許反對派的活動，因此在墨梭里尼和一般黑衫黨人的眼中，藉嚴厲的出版檢查以肅清反法西斯蒂的出版物，確係目前之急務。意大利憲法中所規定的人民之言論、出版自由，是不能算數的。只有墨梭里尼所頒布的出版法，纔有確實的效力。照出版法的規定，凡是從事筆墨生活的人，不論思想家、評論家、著



作家、新聞記者、雜誌編輯，都要到地方官廳去登記，得到許可纔有資格，否則便不能從事這種工作。出版物也一樣，出版之前也須登記。登記前並須填明出版業經營者及職員之履歷；出版機關所在地，出版機關內之一切規則等；連同報告書和聲請登記書繳呈，經過批准，才可出版。這是一般出版物而言，至於在出版界中占主要地位的新聞紙，其規定尤爲嚴厲，除了隸屬法西斯黨和接近法西斯黨的新聞之外，簡直不許有其他種類之新聞存在。現在意大利國內，除了共產黨祕密出版的機關報一致（Unità）之外，其他反對派的新聞，都被肅清了。他們取締異黨新聞的手段，是剛柔並施的：第一是收買其股票，待股票收買到手後，便着手肅清反對派的人們而成爲法西斯清一色；第二爲高壓，收買不成，或用不着收買的新聞，便使用這第二方法予以沒收的處分，結果遂使其不得不自動停版了。意大利負出版檢查之責者，上級機關爲內政部，下級機關爲縣政府。縣長假如認爲出版物是違法的，就有沒收或扣留的權限，不必經過司法裁判；也不呈准內政部，可以直接執行。照出版法的規定，如果出版人認爲地方官廳之沒收或扣留爲無理由，雖能提起上訴，但縱然勝訴，因此所受之損失，却無請求賠償的權利。所以在意大利，地方官廳若要向出版人開一個小小的玩笑，是易如反掌，一點不成問題的；在法西斯統治之下，人民只有絕

對服從的義務，這又算得什麼呢？

(C) 德國 過去的德意志號稱爲『學術之國』對於出版檢查非常寬鬆，除新聞紙和雜誌等定期刊物，於出版後須呈送政府以備審查外，其他學術、技藝的出版物，都儘可自由出版。可是從德國社黨掌政以來，事事效意大利的法西斯情形便完全不同了。在德國社黨政綱第二十二條中，對於取締言論出版的自由，有着極嚴厲的規定。凡是反德國社黨的，淫猥的，一概予以沒收或銷毀，現在的德國出版界，已經造成和意大利一樣清一色的現象了。他們對於新聞紙的態度，尤爲嚴重；德國社黨綱中關於新聞紙有着如下的規定：(一) 德文新聞紙之主編及編輯者，必須是德意志人；(二) 非德意志人所辦之新聞紙，須得國家特許方得出版，並不得用德文刊行；(三) 訂法規定德意志人所辦之新聞紙，不得與非德意志人發生財政關係，如違此法，新聞紙沒收，該非德意志人驅逐出境；(四) 禁止新聞紙作違犯公共福利的宣傳，訂法嚴禁分散民族整個生活的文藝主張，如違此法者予以封閉。——以上規定，不僅只應用於新聞紙，其餘一切出版物之檢查，也一般的以此爲準則。由此，我們可以曉得他們對於出版物之檢查，也與其他政治或教育一般，以維護德意志民族而反對猶太人爲中心思想。德國取締出版物的負責人，爲現任聯邦宣傳部長及

總管國社黨宣傳事宜的戈培爾 (Gobbel) 他是德國人稱爲「鐵帚」而與希特勒之「鐵腕」相對的，可見是非常厲害。他不僅對於出版物舉行肅清運動，對於反對國社黨或與國社黨主義不合的作家個人，也一樣的加以彈壓，以期達到國社黨清一色的世界。舉其一例來說：如著西線無戰事的雷馬克 (Remarque)，因爲描寫戰爭的殘酷而含着反對戰爭的意思，違反國社黨鼓吹戰爭的意旨，他的作品既被政府禁止發行，本人也不能在德國立足。此外亡命國外的作家，更是數不勝數。這種雙管齊下的高壓手段，所獲的效果當然是很大的。

(D) 蘇聯 出版檢查手續的單純，收效的宏大，世界上任何資本主義國家，如英、美、法、日，以及法西斯的意、德，都不及這歷史上第一工人共和國 (The first worker's republic of history) ——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的。他們自從新經濟政策實行以來，除新聞紙外，已允許個人經營一般的出版物了。他們對於出版物，也取着相當嚴厲的檢查制度。一九一九年，人民委員會 (Council of people's commissar) 制定了一種私立出版所取締法，頒布禁例五項：(一) 反蘇維埃的；(二) 揭載軍事秘密的；(三) 破壞良風美俗的；(四) 虛造事實企圖擾亂輿論的；(五) 侮辱少數民族和少數宗教的。而且規定出版物必須先將原稿呈送莫斯科國立出版部，或人民教育委員會地方

支部，經其許可後，纔能印刷出版，不僅個人經營之出版物如此，就是隸屬於政府的公共機關之出版物，也不能例外。出版物假如違犯了以上禁例或擅自出版，便與以禁止出版或沒收的處分，出版人也要受罰。蘇聯出版的每冊書上，都蓋有政府檢查員之印記，及其所編明的檢查號碼和日期。除此之外，在每一個印刷機關裏，政府皆派有名義上的經理，事實上爲監督的人，監視一切出版物的印刷。交來印刷的出版物，必須要先領到『印刷執照』。否則拒絕印刷。這樣一來，不僅出版物不能公開違法，就要祕密刊行，也是很難做到的了。再加以蘇聯的出版事業，私人經營者僅有極少數，大部份爲國家經營性質，而那些國營的出版機關，既無私人潤利的目的，自然不會像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出版家，因金錢的誘惑而幹出不法的勾當了。至於新聞紙，蘇聯是一概由國家經營的，言論與內容早就由黨和政府所規定，所以可說無檢查之必要。外國訪員所發之通訊稿，雖然要經過政府檢查員之審閱，然除惡意的造謠外，善意的批評並不干涉，縱然有時被檢查員所認爲應該考慮之稿件，也不過暫時延擱，一俟詢問商榷後，即可發還。現在莫斯科設有一個審查委員會（Сати），專門負責執行出版檢查，但手續既很簡單，收效可也不小。

(E) 其他 以上所舉，大概可以明白帝國主義的國家，法西斯主義的國家，共產主義的國

家，對於出版檢查的一般情形了。此外，我們再檢視英、美、法三國，對於出版檢查的制度罷。這三個國家之尊重個人自由及民主精神，可說是鼎足而三的。先就英國來說，在號稱君子（Gentleman）的英國人眼中，『自由』本是天賦的，不必在法律中有所規定，所以英國的法律，不論制定法（Statute）或普通法（Common Law）都找不到出版自由或言論自由等名詞。因此，他們對於一切出版物，沒有出版法這特殊的法律，假如出版物有了違法的問題發生，也都受普通刑律的裁判。一旦違法的罪名成立以後，著作人、編輯人、發行人、印刷人、販賣人，皆要負連帶責任，和普通犯法行爲一樣看待。可是在英國，對於出版物的取締大半屬於毀謗和猥褻的範圍，政治作用的雖不能說絕對沒有，但是難得看見的。這是什麼緣故呢？第一，因英國雖有五十多年普及教育的歷史，但他們的學校教育制度是科舉式的，高深的學術只屬於極少數的特殊人物所專有，一般民衆——即所謂 John Bull type 的智識平庸，只知道看些無聊的消遣小說，很少有知道正經書籍的。所以如日本人所謂之『危險思想』在英國的出版物和一般民衆的腦海中，真是罕有所見的了。第二，英國民族有一種保守的特性，所以如法西斯蒂或共產主義，在英國雖然也有人在活動，但要黑化或赤化英國民衆，真是談何容易。其次，那號稱『德謨克拉西』的美國，在

表面上當然處處要表示着自由平等的幌子，所以也與英國一樣，對於出版物是沒有特別的法規的。假如出版物而有違法的事情發生，不過由司法當局按照普通法律裁判罷了。可是也沒有英國法律那樣連坐的規定，只由編輯人負責；編輯人指出著作人時，則由著作人負責。不過這就平日而論，到了戰時便不然了，也不得不拋開『自由』而採取嚴厲的手段不可罷。再次，法國人的高唱自由，也不亞於英、美兩國，在一七九〇年所制定的新憲法中，也曾規定『人民有言論、出版、集會自由』之權。可是話雖如此，他們對於出版物的檢查，却很嚴厲，對於向來早有制定的出版法規，一直到現在還存在着。法國出版檢查與衆不同的有兩點：第一，法國對於有傷風化的書籍和圖畫，檢查格外嚴厲，一八八二年甚至於出版法之外特別制定了敗壞風俗禁止法 (*Loi relationa la respressiondes outra yeux bonnes moeurs*) 以補助出版法之不足；第二，違法出版物被檢出之後，出版人以主犯論罪，著作人以從犯論罪。以上二點，爲法國出版檢查制度之特別規定，是世界上任何國家所沒有的。

上面所列，大概可以明白世界各國出版檢查的近況了。總括的說，不論任何主義的國家或黨派，對於出版的檢查，是沒有不重視的。現在再來回顧我國的出版檢查罷。

#### 4. 我國之出版檢查

我國出版事業發達遲緩，它的產生，只有很短的歷史，嚴格的說起來，僅有十餘年的歲月而已；就是把前清官辦時期計算在內，也不過三十餘年罷了。現在把這其間的出版檢查制度，按順序說明於下：

##### (A) 滿清政府時期

這時期的前期，即所謂出版事業官辦時期，出版的書籍全由官廳所壟斷，當然只有歌頌聖德，點綴太平的文字，根本就用不着出版檢查的了。這一時期，人民出版言論的自由用高壓的手段被剝奪無遺，縱有千萬的悲憤，也無從發洩。及至鴉片戰爭，義和團事變等，對外戰爭一敗再敗，人民的悲憤達於極點，思想上起了空前的變化，一般智識份子乃紛紛出版刊物，發表對於時事的意見；於是出版事業便由官辦時期一變而成民營時期了。當時滿清政府雖竭力運用他們的高壓手段，頒布完全模倣日本的新聞紙法和出版法的大清報律、大清印刷物專律等，正式產生中國之出版檢查制度了。光緒三十四年四月修訂的新刑律中，對於出版物的取締，竟逸出出版法規外有了更嚴厲之規定，對違法出版物的負責者之處分，不僅有有

期徒刑與罰金，並且有無期徒刑與死刑。可是這種專制的高壓力量，不但不能威脅膨勃的民情，反使時代的新潮益加氾濫。

(B) 北京政府時期

民國成立之初，憲法中規定『人民有言論、著作、及刊行之自由』

儼然實行『德謨克拉西』的政治了，所以出版檢查，也曾經有一度的解放。民國元年三月，南京臨時政府雖曾頒布民國暫行報律三章，但因新聞界的反對，隨即下令取消，所以當時的出版界，曾風起雲湧，逞一時之盛況。然而好景不常，隨袁世凱的野心，出版檢查制度也就恢復了原狀。民國三年四月二日公布報紙條律；同年十二月四日，又公布出版法，規定禁例八項：一、淆亂政體者；二、妨害治安者；三、敗壞風俗者；四、外交軍事之祕密及其他政務經該管官署禁止登載者；五、預審未經公判之案件及訴訟之禁止榜聽者；六、國會及其他官署會議按照法令禁止榜聽者；七、煽動曲庇贊賞救護犯罪人，刑事被告人，或陷害刑事被告人者；八、攻訐個人陰私損害其名譽者。而且不僅書籍，報章在檢查範圍之內，即如信柬、報告、會章、校規、族譜、公啓、講義、契券、憑照、號單、廣告、照片等，倘在出版後有違反八項禁例之任何一項時，都要照出版法所規定的罰款處罪。後來黎元洪入京主政，下令廢止報紙條律；至於出版法，則於民國十五年一月二十九日，纔由段祺瑞因報



界的要求而下令宣布無效的。這樣，表面上雖沒有了關於出版物的單行法規存在，其實軍閥割據的時候，地方官廳名義上雖隸屬於北京政府，事實上各地之大小軍閥各樹一幟，擅自爲主，政令既不統一，關於出版檢查也任意施行，作爲排除異己的武器。再加以檢查人員的智識缺乏，由毫無常識者充任，往往鬧出極大的笑話。著者的一個朋友，曾因一本魯迅的吶喊，說是用的紅色封面有赤化嫌疑，冤枉吃了好幾天的監獄飯。這類怪事在軍閥時期是屢見不鮮的，真可謂是昏天黑地的了。

### (C) 國民政府時期

北伐告成，國府奠都南京後，由軍閥割據的局面轉變爲所謂『以黨治國』的國民政府時期，除了國民黨以外，當然不容有第二種政治組織的存在。因此，國民政府於十八年頒布出版條例原則六條，嗣又由中央常務會議通過日報登記方法十三條。然而這兩種出版法規，都不過是暫行性質，所以國民政府又在十九年十二月十六日公布正式的出版法，把以前關於出版的法律，一概廢止了。現行出版法中，把出版物的主管範圍和監督責任，劃分得非常清楚。一般新聞紙或雜誌的主管機關，歸屬於行政院所屬之內政部，出版登記手續，則向地方最高行政機關之省政府或特別市政府，轉向內政部核發登記證。倘係刊載有關黨義或黨務

的出版物，同時須向省黨部或特別市黨部，轉向中央宣傳部聲請登記。出版物之禁例共有四項：  
一、意圖破壞中國國民黨或三民主義者；二、意圖顛覆國民政府或損害中華民國利益者；三、意圖破壞公共秩序者；四、妨害善良風俗者。出版物在出版後，須分別送寄內政部和中央宣傳部檢查，以便檢查有無違禁的文字。不過，最近出版檢查略有改變，中央黨部因出版檢查事實上有統一事權之必要，特由中央宣傳委員會組織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專門檢查一切出版物；同時又設立一個中央新聞檢查處，由中央派人實施新聞檢查。這兩種新的組織，雖然是出版檢查制度中的一種變動，但其表現黨治的精神，却是始終一貫的。

以上為中國出版檢查之沿革與現狀，但因限於篇幅只能作極簡單的敘述而已。而且上面所羅列者，僅就平常時而論，以下再就非常時期和戰時的出版檢查，及應該注意的事情略說一二罷。

### 5. 非常時期之出版檢查

非常時期或戰時的出版檢查，與平時的出版檢查在其方法與目標兩方面都有很大的差

別；前者爲對內與對外並重，後者一般的偏重對內一方面而已，這在前面早已說過的了。標榜民主政治的國家，實際上出版檢查不論如何嚴厲，但表面上仍戴着人民有思想、言論、出版自由的假面具，不肯流露可怕的本來面目。可是處在非常時期或到了戰爭將要勃發，或戰事已經開始的時候，便與平時大不相同了。無論什麼政體的國家，到了這種緊要的關頭，就不得不剝下一切美麗的外衣和自由的幌子，露出猙獰的真面目來了。一個民族或一個國家，爲圖自己的生存起見，這是必然的事情。到了時局急迫的時候，對於出版檢查若稍稍疏忽，往往會釀成極大的危險。如在歐戰時，英國政府攻德的軍隊人數，本來是守着極端祕密的，後來因爲英國政府官報中關於病兵的報告，有了『在法國之英國病兵爲全軍的百分之幾』一行數字，竟被德國偵探推算出軍隊的確數。徵此一事，可見在非常時或戰時，出版物所及於時局的影響，是多麼重大呀。尤其是我們中國，出版檢查中本來有着兩種痛心的畸形現象，所以對於非常時期的出版檢查，更不可不取慎重的態度和適宜的處置。

兩種畸形的現象是什麼呢？第一，是外國出版物之不受出版檢查的限制；各國在華之新聞紙、通訊社，都藉租界及領事裁判權爲護符，任意對我國造謠，中傷。第二，是租界中的出版檢查：如

東方雜誌的五卅特刊之被控告，上海民國日報及光華書局之被查抄等。不平等條約一天不廢除，租界一天不收回，這兩種畸形的現象也將永遠存在，而且變本加厲，會現出更可怕的面目來罷。近來更有已經審查或註冊的書籍，霎時間竟會變成了『危險思想』，亦有已經出版較久推認為喚起愛國意識的讀物，一刻工夫竟會突成爲『妨礙邦交』的東西。於是燬版、刪改、封存……把出版界弄得昏天黑地，不知所措。這是什麼緣故呢？聰明的讀者不難知道它的原因是在那裏罷。於是，我們更不難揣度那負着出版檢查之責的政府，又是多麼爲難呀。

在這裏，我們就可以明白了。際此非常時期，負責出版檢查的政府檢查機關與從事出版事業的出版家，不是處於敵對的地位，而是互相扶翼的提攜者。兩者應該在自己的立場上互相砥礪，互相督促，要在不『妨礙邦交』的圈子內，指示國民以我們的敵人，引起民衆的敵愾心，鼓舞民族的意識。至於足使資力和人力浪費的出版物，墮落民志和渙散民心的出版物，尤其是非常時期的出版檢查所不能輕易放過的。

### 三 出版事業之動向

#### (一) 各國出版事業之趨勢

對於世界各國的出版事業若要不加以檢視，決非本書這樣小冊子所能做到，現在擇其重要者作簡要的敘述，其餘只得由此類推了。我現在所選擇者，即蘇聯、日本與德意志三國，以代表共產主義，帝國主義和法西斯主義這三種政體的國家。據最近所調查各國出版圖書數，可列表如下：

國 別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一年	一九三〇年	一九二九年	一九二八年
蘇 聯	三五、一一〇	三八、四〇三	三四、一九五	二九、四七四	—
日 本	二二、一〇四	二三、一一〇	二二、四六七	二一、一一一	一九、八八〇
德 國	二一、四五三	二四、〇七四	二六、九六一	二七、〇〇二	二七、七九四
法 國	一五、八五二	一四、〇五五	一四、三七二	一四、六六〇	一五、六三二
英 國	一四、八三四	一四、六八八	一五、三九三	一四、〇八六	一四、三九九
意 國	一二、五四五	一二、一九三	一一、九四九	八、四四二	七、三一八
美 國	九、一三五	一〇、三〇七	一〇、〇二七	一〇、一八七	一〇、三五四

丹麥	三、一四二	三、一三八	三、四一二	三、二五七	二、八九三
匈牙利	二、八四二	三、一六九	三、四〇三	二、九八二	三、五〇七
保加利亞	二、四八八	二、四〇四	二、九六九	二、五九五	二、七七五
瑞典	二、五〇五	二、六四三	二、六六〇	二、六七三	二、七二五
瑞士	二、四四四	二、〇四九	二、〇九五	二、〇〇九	一、九二二

綜觀上表所示，我們便可以明白出版物在數量上占世界第一位的，不是帝國主義的日本，更不是『鐵腕』獨裁下的德意志，而是工人共和國的蘇聯。這是什麼緣故呢？

### 1. 蘇聯之出版事業

(A) 蘇聯之出版概況 蘇聯的出版事業，在數量上、門類上都有着長足的增加，他們每年的出品，是全世界其他任何國家所望塵莫及的。在過去幾年中，蘇聯每年平均有五萬種書籍出版。一九三二年，每種書籍平均印行總在一萬冊以上；其中百分之五為兒童及青年讀物；百分之十三為中小學校的教科書；百分之十八為科學的或專門的書籍；其餘百分之六十四則係民衆

所需要之讀物。所出版之書籍，大部分爲平裝，售價極廉，所以大家都能購買。

蘇聯出版的書籍範圍很廣，在過去幾年內，則係科學的和技術的書籍占大多數。此外農業書籍的出版，也很驚人的。一九二八年，蘇聯關於技術和農業的書籍有三千七百種，到一九三二年，增加到一萬二千種了。一九三四年，國家技術出版事務所所印行之書籍有四百五十萬冊，三百十八種，都是關於物理學、數學、天文學、測地學、地質學、歷史、哲學、自然科學等書；其中有新書，有舊書，又有各國實用的科學書及一部分科學名著。

去年——一九三五年九個月間，出版書籍計三萬一千五百萬部，三萬一千種。圖書的種類，以社會政治部門佔最多數，有八萬四千種；其次爲技術書，有七萬九千種；再次爲藝術書，有四萬四千種。出版所中最活躍的，爲黨出版所，教育出版所，農業出版所，文學出版所等。

據國立文藝出版所的計畫，在一九三六年將發行二千一百二十一萬部的書籍一千種，於一年間發行四萬萬部，較去年之二萬五千五百萬部再增加二萬萬部；增加最多的，爲俄羅斯古典文學及外國文學。此外，現在的蘇聯作家的新作品，把資本主義社會之沒落，寫實地反映於自己作品中的若干大布爾喬亞作家之新作品，也將於本年度出現云。

再就蘇聯的一個共和國蘇俄（即蘇聯之一邦）而論，一九三四年之前十月，所出版之書籍連小冊子在內共有三千種，而在各地銷售者達三萬萬五千八百萬冊。在革命前，一九一三年為帝俄出版事業最旺盛之一年，計出版書籍僅兩萬種，八千七百冊。自從蘇俄國家出版局成立以來，該出版局為全世界最大之出版事業組織，到現在已有十五年歷史，在此十五年間，蘇俄出版的書籍總共已有五十萬萬冊，此外其他各機關所出版者，計有二十四萬萬冊，十萬四千二百二十一種。在革命前三十年內帝俄所出版之書籍，總數也不過二十萬萬冊而已。由此可見他們的努力了。

現在蘇聯還正在印行一種便宜叢書，其中包含有五十種現代俄羅斯的，外國的，和其他小國的作品，裝幀都非常美麗。第二次五年計畫，對於書籍和雜誌的產量，更有着驚人的激增。一九三二年共有三十三萬萬六千三百萬冊，到一九三七年，將增至六十八萬七千五百萬冊。其中百份之三十，為教科書。

（B）蘇聯之新聞事業 其次，再說一說蘇聯的新聞事業罷。自從十月革命以來，蘇聯的新聞事業之突飛猛進，尤是不可否認的事實。新聞事業在蘇聯，是不許個人經營的，所以報紙俱為



國營，絕對不是商業性質的，這在上面出版檢查的部分早已說過的了。因此報紙在蘇聯，是促進社會主義建設成功及推進民衆教育的唯一利器。

當一九一三年帝俄時代，俄羅斯的報紙真是貧乏得可憐。全俄羅斯一共僅有八百五十九種報紙，總銷數僅兩百七十萬份而已。當時的所謂讀者，僅是些王公貴族和智識份子罷了。可是十月革命以後，這種情形便有了很大的變動，當一九三二年，即第一次五年計畫完成之時，報紙的總數已增加到六千六百七十四種，較之一九一三年增加了七倍以上，銷行總數則增至三千五百五十萬份。今年一年間，報紙數可增加到一萬種以上，銷數可增至三千九百萬份。

而且不僅數量及銷數上激增，有着顯著的進步，同時發行的區域也非常的廣泛，民族文字的種類也非常繁多。當帝俄時代，報紙發行的地域僅限於莫斯科及聖彼得堡兩地，現在則遍跨歐亞兩洲了。如靠近烏拉爾（Ural）山的乞略賓斯克省（Chelyabinsk），在帝俄時代是一個文化最落後的地方，現在竟一躍而成爲蘇聯的工業中心之一，報紙的種類也已達百餘種以上。至於各民族的報紙，大革命之前，許多民族都沒有書寫用的文字，當然無所謂報紙之可言；現在蘇聯提倡拉丁化字母，很多文化落後的民族，俱有了書寫用的文字，編印書籍及報紙等。現民族

報紙的種類凡三千三百多種，就中以烏克蘭文最多，占兩千一百七十二種；此外，如猶太自治區也有報紙。甚至從前過着流浪的車輪生活的吉普希（Gypsy）民族，現在也成爲一種定居的民族，除有學校及劇院外，也有用吉普希語所發行之報紙。

蘇聯最主要的報紙，爲真理報（Pravda）及新聞報（Izvestia）兩種；真理報代表黨，是全蘇聯黨中央委員會之機關報，出版於一九一二年五月五日，爲代表俄羅斯勞動階級發言及由勞動階級集資創辦的第一種報紙，出版於聖彼得堡（即今之列寧格勒）。蘇聯政府爲紀念這一個創刊的日子，就規定這較五一節後四天的五月五日爲「報紙紀念日」。蘇聯各地的報紙，每年到了這一天均發行紀念特刊，並於當日舉行各種慶祝會。該報銷數，達一百九十五萬份，爲蘇聯銷路最廣的報紙。新聞紙代表政府，是全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機關報，創刊於一九一七年，銷數爲一百六十萬份，推行也很普遍的。此外，各業有各業的報紙：如工業方面，有重工業人民委員會的機關報工業化（Za Industrializatsiu）；農村方面，有屬於黨中央委員會的農民新聞（Krestyanskaya Gazeta）；專銷行於集體農場及國家農場中，青年有青年黨員真理報（Komsomolskaya Pravda）；兒童則有少年先鋒真理報（Pionerskaya Pravda），銷路亦各有五

六十萬左右。

這少年先鋒真理報，是蘇聯少年先鋒隊的總機關報，創刊於一九二五年，去年十月二十五日曾舉行過十週年紀念。這個小型報紙，可說是兒童寫給兒童看的報紙，是蘇聯新聞事業中的一個特點。該報隔日在莫斯科出版一次，共計四頁；報館職員三十五人，其中十六人爲記者，報上材料百分之八十，是各地特約的兒童通訊員供給的。現在擔任總編輯者，爲A.斯脫洛也夫；先前做過哈可夫通訊員的一個少年，現在擔任着運動遊藝欄的主編；先前由基甫投過稿的少年詩人 J.克希萊斯基，現在主持着文藝欄。據斯脫洛也夫的自白：『這些少年先鋒隊，即使碰到自己的父母或是自己的親戚犯了反蘇維埃，反社會主義的罪，也決不遲疑，立刻會報告出來的。』先鋒真理報常常登載關於科學和技術的有趣文章，間或插有關於無線電礦石機，家庭電話，小機器之類的圖表。用問題的形式徵求答案的遊戲通常有兩種，答中的可以得到贈報或別的獎賞。

蘇聯的新聞事業中還有一種特點，即壁報（Stengoyeta wall news paper）之普遍；差不多每一個機關，每一個工場，每一個農場中，都有他們的壁報，編輯者及撰稿人就是工人和農人自己。蘇俄所稱爲『工人通訊員』（Rabkor）及『農人通訊員』（Selkor）都能儘量發表他

們自己的意見，批評或組織他們的工作，以及提高工作水準等。壁報中發行最久者，爲莫斯科史太林汽車工廠機器部的日刊壁報修理（Remont），發行已四年之久，撰稿的工人通訊員共有一百五十人，編輯部計二十八人，輪流編輯，而由一位女工擔任着總編輯。此外工廠印刷報紙的也很多，如列寧格勒的史太林五金工廠的史太林者（Stalinet's），已出版至第一千期，其通訊員達千人以上。

蘇聯報紙的編製及其內容，也完全與其他任何國家異其趣旨。在蘇聯的新聞紙中，我們看不到姦淫搶劫和招搖撞騙一類的新聞，這是社會制度轉變之後的一種必然的結果。在資本主義的國家中，獨立報紙全靠廣告的收入而維持，同時不能不將自己的報紙推廣，以發展其營業。可是蘇聯的報紙則不然，是很少看到廣告的，現在雖也逐漸增加廣告的地位，但其廣告的作用僅在於公告而已。蘇聯報紙的張數並不多，即如真理報及新聞報，也不過四面至六面，但編製非常精審，報題旁俱有標題索引，且登載各種有價值的論文及通訊。

上面所舉，爲蘇聯出版事業進展的情況。至於蘇聯的文化之突飛猛進上演着極其重要的任務的，歸納起來有兩件不可磨滅的偉大工作：第一爲文盲的剷除；第二就是拉丁化字母的倡

行。當帝俄時代，全俄羅斯的人口，有三分之二是文盲，鄉村的人口總數爲一萬一千五百萬人，這些人甚至有終身沒有讀過一本書一份報紙的。現在蘇聯的人口爲一萬七千萬人，自從蘇聯從事掃除文盲的工作以來，識字者的百分數已增加到百分之九十，都能閱讀書報了。蘇聯黨最高機關的報紙雜誌管理部部长泰爾(B. n. Tai)，曾在今年報紙紀念會上演講說：『莫斯科省有好幾區，平均每四個人就有一份報紙；至於城市中訂閱幾份報紙的人，則更多。』由此可見一般的趨勢了罷。又文字的繁雜，實爲阻礙文化發展的主要原因，所以阿刺伯字母、蒙古字母等等的拉丁化，實在是很重要的急務。現在蘇聯境內有七十四個民族，採用了拉丁化的字母，其中有四十個民族，從來是沒有文字的，現在都能編印書籍和報紙了。這確是值得我們效法和注意的兩件偉大工作。

## 2. 日本之出版事業

(A) 日本出版界之近況 日本的文盲，就其面積和人口的比例來說，本來並不亞於我國。及至明治維新以後，由明治天皇下了普及教育，掃除文盲的勅語，而且儘量容納外來的文化，打

破閉關自守的局面，時至今日，就是下女走卒也沒有不識字不讀書的人了。最近的日本，非但在軍事工商業諸方面，想追隨世界的一等強國，同時在文化諸部門，也無不竭力掙扎着；這種現象，在出版界方面也充分表現出來。下面所述的，就是最近五六年來，日本出版界活躍的情況。

種類	昭和八年(1933)	七年(1932)	六年(1931)	五年(1930)	四年(1929)
單行本	二四、〇二五	二二、一〇四	二三、一一〇	二二、四七六	二一、一一一
其他	一〇、三八一	九、二九六	九、八九六	一〇、三三九	一〇、三四一
雜誌	九一、四八九	五三、九五七	四一、四五六	三九、三三九	三七、四〇三
共計	一二五、八九五	八五、三五七	七四、四六二	七二、一五四	六八、八五五

上面的表格，是根據東京時事新報的調查的；由該表所示之數字，我們可以知道日本出版物的數量，年年只是有增無減，而昭和八年度，尤有了顯著的激增。現在再把昭和七、八兩年間的單行本，就其向內務省（即內政部）註冊時的類別，比較如下：

	昭和八年	七年	昭和八年	七年	昭和八年	七年		
政治	五八一	六四一	地誌	七〇八	七四一	醫學	七七一	六九五

傳記	三〇二	二八四	工學	三八七	三七三	娛樂	四五二	四六三
歷史	四五五	四二一	哲學	五六四	五四八	家庭	一、一二〇	六七二
語學	八六二	八一三	宗教	一、〇四五	九三〇	辭典	一五一	一三八
文學	二、六五二	二、二七一	神學	二二六	一九〇	技藝	九四	八四
教科書	一、九四八	二、一一二	統計	一〇四	一一七	音樂	九一五	一、〇〇九
教育	二、七二七	二、二二四	雜類	三、〇二七	二、五四七	美術	八四四	七一
社會	九九〇	一、三二一	理學	四五八	四六一	軍事	一五六	一六二
經濟	一、一二八	一、〇三六	數學	八七	八〇	交通	七三	四五
法律	六九九	五七四	紀行	四九	三九	產業	四三	三八四

根據上表的數字，昭和八年度の單行本共有二四、〇二五種，較七年度之二二、一〇四種增加了一、九二一種。就其類別而言，所增加者，教育五〇三，文學三八一，家庭三四〇，美術一三二，宗教一一二，經濟九八等，爲其代表的；所減退者，社會三三一，教科書一六四，音樂九四，政治六〇等，爲其主要部門。現在把這昭和七八年度的比較，與昭和七年前一年之昭和六年之比較，再拿來比較一下，這其間便能發見很有趣味的現象了。昭和六七兩年度比較的結果，增加者

之中，政治一二三，歷史一一二，傳記六六，文學四三，社會四二，軍事三五等爲其最顯著者；減退者之中，有產業，美術，娛樂，家庭合計約四〇〇種，及教育，宗教合計約六五〇種。把前年度的這個比較，與本年度的比較再比較一下，我們能從這些數字上，顯然可以窺知時局的遷變。意即，據六七兩年度的比較，所增加的政治書籍中，雖多少有點左翼的東西，但大部分則屬於『法西斯蒂』、『國家社會主義』及『李頓報告書的研究』一類東西，至於七八兩年度的比較中政治之反而減少了六〇種，其原因大概在於『日本精神』或『皇道精神』之類右傾的政治書雖陸續出現，至於左翼的政治書籍，却已沒落而至於絕無僅有了。那麼昭和七年較前六年減少的宗教、教育、家庭、美術等，八年度爲什麼反見激增呢？蓋因昭和六年至七年，爲由平常時向非常時急轉直下的過渡時期，勢非把目光轉向於與非常時期關係密切的政治、經濟、軍事、歷史等不可，及至這些需要的東西有了相當的進展，於是前此不遑回顧的美術、宗教、家庭等書之又被注意而逐漸增加，却是必然的結果罷。

昭和九年（一九三四）度，日本的出版界和前幾年不同之點，爲左翼作家『轉向』者佔百分之八十，餘者亦不易支持，普羅文學已到了日暮途窮了。隨左翼的沒落，所謂大眾文學竟獨



霸日本文壇，連前此不苟於和左翼合作的純文藝派，也岌岌乎可危了。而這裏所謂大眾文學，與我國所喧嚷的大眾文學不同，那不過是充滿着低級趣味的長篇或中篇的小說，既無中心思想，更無所謂理論，倒很像我國的所謂『鴛鴦蝴蝶派』或『禮拜六派』一類東西。他們既專以迎合低級社會的心理爲能事，書籍的銷路當然暢旺，而大眾文學者們的稿費也很可觀的。普通每張不到四百字的稿紙，可以掉得稿費二十元，像菊池寬等他們所謂第一流的人物，尙不止此，每頁可得稿費四十至五十元。至於純文藝派的稿費，每頁僅值五元至十元，還是不易出脫。他們自己的同人雜誌，大多數沒有稿費，所以純文學者的生活是不能樂觀的。日本文壇中堅作家尾崎士郎氏，曾在文藝講演會中高喊『文學之勝利與人生之敗北』，這一方面固然是對大眾文學的諷刺，但另一方面未嘗不是表示自己的苦悶。

綜觀以上情形，日本出版界在數量上雖年年有增無減，但就質的方面而論，尤其是文壇的趨向，不僅不能謂之成功，毋寧是失敗的。倒是外國出版物的翻譯，却很努力，世界的名著差不多都有日譯本了。如世界大思想全集，世界文學全集，世界美術全集，社會思想全集，馬克斯全集，近代劇全集等，都早已出版。尤其是中國的文化，日本人更竭力介紹，不肯放鬆，這一方面是因歷史

和地理上的關係使然，一方面不得不說是一種野心。中國的古文學及古代哲學之註釋和翻譯，如中國文學全集，論語正義，禮記正義，文鏡祕府論，莊子，中國古器圖考，御注孝經，老子集說，唐詩選，十八史略讀本，宋元明清書畫名賢詳傳，古文真寶，文章軌範……等，有許多還是影印的。此外關於語學，如中華國語教科書，華語初階，華語急就篇，日支會話等；及中國的舊小說，如水滸，紅樓夢，三國志演義，金瓶梅之類；都有好幾種的日譯本。但近來日本關於中國的出版物也有了變動，把目光從古代的舊文學轉移到政治、經濟及現代政局方面了。試觀今年一二兩月間日本所出關於中國的書籍，有哲學書四，文學書二，語學書二，政治及經濟書六，反而關於華北及滿洲的研究，如滿洲王道之片鱗，支那地名集成，第一回滿洲研究團報告，殷汝耕與冀東自治及我國大陸政策之方向，華北獨立運動之停頓與日本之決心，亡去之支那，從國防觀察日滿支關係……等書，竟有十七種佔全部半數以上。由此，我們大概可以窺知日本的出版界，在所謂非常時期中是怎樣的動向了罷。

(B) 日本之新聞事業 日本新聞事業總共不過六十餘年的歷史，在這短促的六十餘年間，他們的努力是值得我們欽佩的，僅就東京一地而言，現有日報二十餘種，而且都是大型的報

紙，並無小報。其中歷史最久者爲東京日日新聞，創刊於明治五年（一八七二），是日本第一流的日報。現在東京日日新聞社所出版的，共有定期刊物十種：日文日刊二種（東京日日新聞，分朝刊，夕刊二種）及大阪每日新聞，英文日刊一種（英文東京日日新聞），週刊二種（盲人讀物及畫報各一），月刊一種（電影教育），半月刊一種（經濟雜誌），半年刊一種（大眾文藝），年刊二種（年鑑及英文日本介紹）。該社的範圍非常廣大，組織也很複雜，茲將其組織列表如下：

(一) 股東會直屬：1. 祕書課 2. 事業課 3. 運動部 4. 航空部

(二) 編輯局：1. 論說委員 2. 整理部 3. 政治部 4. 社會部 5. 內國通訊部 6. 經濟

部 7. 學藝部 8. 校對部 9. 寫真部 10. 外國通訊部 11. 調查部 12. 地

方機關 { B.A. 支局 13. 東部聯絡部 }  
 { B.A. 通訊部 }  
 { B.A. 電送寫真係 }

(三) 營業局：1. 販賣部 { B.A. 管理課 } 2. 廣告部 3. 庶務部 4. 會計部  
 { B.A. 遞送課 } D.C. 活動寫真班  
 { D.C. 郵寄課 }

1. A. 廣告會計課 5. 印刷部 { B.A. 活版場 }  
 { B.A. 鉛版場 } D.C. 印刷場  
 { B.A. 寫真製版係 } E. 其他各係

社內現有飛機十五架，汽車十餘部，運貨汽車三十餘部，腳踏車五十餘部，購製專用電話機

三十餘萬元，電話遍設於各市縣。世界各大都市都有常駐的特派員，各重要地方亦派有通訊員，並蓄有傳書鴿數千隻。現在共有從業員六、一三一人：東京三、六〇八，大阪二、五二三。東京市內及近郊共有出張所二百，從業員三千人。全社每日用水達三千石，每月九萬石，約需水費千元；室內電燈共二千餘，電費每月三千八百元；瓦斯費約三千元。又據該報編輯部的統計，每天要用稿紙二萬張，支局和通信社三萬張，合計五萬張；每天所用墨水九升，鉛筆二百支，毛筆八十支，鋼筆尖一百個。由這些數字上推測，可知其範圍之廣和規模的宏大了。該社對於社會事業和慈善事業，也都很熱心，據說在過去十三年間，所捐出的捐款總額達百萬元以上。如「巡回病院船」「罹災者慰問」「帝國風景院」「東亞調查會」「農業博物館」「健康相談所」「傳染病預防會」等，都是該社所創設的。

還有一個東京朝日新聞社，資本的雄厚，聲勢的浩大，堪與東京日日並駕齊驅，日本人給予這兩個報紙以一個誇張的名稱，稱爲「兩個新聞王國」。朝日新聞社的組織，大體皆與日日差不多，分不出什麼高下，而且它的地位也並不在東京日日之下。除這兩個新聞社之外，時事新報，讀賣新聞，國民新聞等，銷數都在五十萬份以上，也是聲譽卓著的。東京的報館有的創設於六十

年前，十之八九創業於三十年以前，昭和年間新近創立者，僅有日本評論新聞及帝都日日新聞二種而已。

日本全國現在共有日報二二六種，茲將各大都市日報之分布情形簡述如下：東京有日報二十三種，股份公司十三家，個人經營者八家，匿名組合一家，合資經營一家；大阪二十種，股份公司九家，個人經營十一家；離東京十餘里的橫濱，亦有日報兩種，股份公司一家，個人經營一家；橫須賀一種，個人經營；福岡市三種，股份公司一家，個人經營二家；仙台市三種，皆係個人經營；名古屋四種，股份公司，個人經營各二；京都四種，股份公司一家，個人經營三家；神戶五種，股份公司四家，個人經營一家；廣島五種，合資經營三家，個人經營一家；長崎三種，均屬股份公司。其餘如溫泉地別府，極北的北海道或其他小地方，也都有日報一兩種。

近代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全國的產業都有集團化的傾向，新聞事業恐怕也不能例外罷。日本當今最大的兩個財閥——三井和三菱，不僅在全國工商業的重要部門都佔有莫大的勢力，往往都市上的大百貨商店和大劇場，也不出這兩大財閥的系統。據說大阪朝日新聞代表着三井系的輿論機關，而大阪每日則代表着三菱的。從兩報的態度上看來，這番話是不無因由的。

而且這就是資本主義國家演進上必然的結果吧。

還有一點是應該明白的，就是自從日本侵佔了我國東北四省之後，日本的新聞紙完全換了一副面目了。這是什麼緣故呢？蓋在『非常時』新聞紙是完全被統制了的，即使不替進軍的勇士們吹喇叭，也得在旁邊敲幾下邊鼓，否則編輯長就不堪設想了。例如重壓在國民身上的占歲入百分之四十七的軍用費，竟沒有一篇報紙敢做一篇評論，沒有一個新聞人敢說一句正論，祇在要求軍事費問題的時候，微溫地寫了一篇非常時財政的危機罷了。徵此一例，便可以推想到其他一切了罷。

### 3. 國社黨統制下之德國出版界

號稱『學術之國』的德意志在出版事業方面，本來是執着全世界出版界的牛耳的，學術書籍是當然的了，就是其他出版物，也是世界上其他任何國家所望塵莫及的。可是，自從國社黨執政以來，出版界受着無理的摧殘，德國書籍的生產衰落得非常厲害，已由第一位退居於第三位了。下面所示的數字，是德國最近八年間書籍生產量之比較，由此可見其衰落的狀況了罷。

一九三四年	一九三三年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一年	一九三〇年	一九二九年	一九二八年	一九二七年
二〇、八五二	二一、六〇一	二二、四五三	二四、〇七四	二六、九六一	二七、〇〇二	二七、七九四	三一、〇〇〇

一九三四年全國出版的書籍共計二〇、八五二部，可是一九三三年出版的，却有二一、六〇一部，一九二七年出版的，却有三一、〇〇〇部。在一九三四年出版的兩萬部書中，有十七萬部以上屬於新書；而這些新書，不是國社黨員的大作，就是擁護『納粹』的小冊子。一般書店的書架上所陳列着的，希特勒的我的奮鬥約佔半打以上，再加幾本戈林的作品，幾本宣傳部長的傑作，以及其他許多同一範圍中的書籍。至於馬克斯·恩格爾、約瑟夫·烏利雅諾夫、考茨基、盧那卡爾斯基及其他許多俄國作家，當然是被禁止的；此外如敏陳堡 (Minyenberg)、雷馬克、奧希茨基 (Ossietyky) 和赫爾茨斐爾德 (Heryfelde) 的著作，也絕對不許發賣。衝鋒隊員和祕密警察 (Geatapo) 時常闖進書店中搜尋，有沒有匿藏違禁的書籍，他們在房角落裏搜索，在每一個罅洞或裂縫裏張望，假如那裏有地下室，他們便立刻衝進去了。那麼違禁的書籍在德國難道因此而絕跡了嗎？這却不然，一位美國的記者曾經一個『先進份子』的介紹認識了一位書店老闆，他曾從書架上所陳列着的國社黨員的大作後面拿出用紙包裹着的一包一包書籍，有烏

利雅諾夫的帝國主義及其他許多德國政府所嚴禁着的出版物。最後書店老闆，還指着書架上『納粹』的書籍，對那位美國人說：『這些廢物，就是褐衫黨員也懶得去看的。』然後他又指着紙包中的書籍說道：『我有二百個常臨的顧客，常替自己或朋友來買這些書。否則，我怎能在這裏立足呢！』而且據說這種書店在柏林有着很多，很多，多得出乎我們的想像以外。由此，我們可以知道國社黨嚴厲的高壓手段，也不過僅獲得表面上的成功而已。可是這世界上常居於最先進的國家，他們的出版事業，却確在經歷着空前的衰落時期却是無可諱言的。

其次，再回顧一下德國的新聞事業罷。許多年來，德國的報紙一直保持着最優越的地位，在十九世紀初葉，可太所編的奧格斯堡新聞報（*Cottas Augburger Allgemeine Zeitung*）為歐洲政治家們所重視，保持着世界新聞事業的領導地位。就是其他德國所出版的報紙，一般的都有着最迅速而準確的消息，編輯也極得法，對於政治、經濟、文學、科學，一切方面都提供了優良的豐富的材料。但自國社黨掌政以來，那些偉大的業績和光榮已絲毫無存，已成過去的陳跡了。許多世界上馳名的報紙，如伏錫志新聞（*Vossische Zeitung*），柏林交易所新聞（*Berliner Borsencourier*），每日評論（*Tagliche Rundschau*），新巴登公報（*Neue Badische Landes-*



tung) 哥尼斯堡新聞 (Königsberger Hartungische Zeitung) 以及漢堡的幾種最大報紙，現在都已經消滅了。所剩下來未停刊的報紙，如柏林日報 (Berliner Tageblatt) 等，也岌岌可危，大概也難能持久罷。去年 (一九三五年) 『泛德意志』 (Dangerman) 的機關報，代表着易北河 (Elbe) 東部地主們的德意志新聞 (Deutsche Zeitung) 和天主教工會領袖斯泰格華特 (Stegerwald) 所創辦的，『德國勞工陣綫』的機關報德意志報 (Deutsche) 也都停刊了。最奇怪的，就是國社黨自己的機關報或在國社黨指揮下的報紙，竟也遭受着同樣深刻的不景氣。如官方報紙國民觀察報 (Völkische Beobachter)，雖具備着優越的經濟條件，受着黨政機關的扶助，而竟僅有三十三萬六千份之銷數而已；若和過去德國的幾種大報之銷路比較，這個數字真是渺少得可憐的。其他現存的報紙，銷數也都跌到過去的一半或不到一半。現在，德國的人民自己都不信任德國出版的一切出版物了，尤其對於除掉不可信任的字句外空無所有的報紙，更不願意閱讀；這也是德國出版事業衰落的最大原因之一。總之，過去在世界上有着莫大光榮的最先進之德國，自從跌入國社黨手中之後，這產生詩人和思想家的國家，竟淪而為遲笨的，無感覺的，文化落後的國家了。

## (一)吾國出版事業之趨勢

### 1. 中國出版界概況

嚴格地說，中國出版事業之歷史，至多僅有數十年之歲月而已。雕版印刷術之創始，雖遠在八九百年前，但我們現在這裏所說的出版事業，乃指出版新文化書籍的新書業勃興以來的出版事業而言。自從新書業的勃興到最近，爲敘述上的便利起見，我現在把中國的出版界分爲三個時期：(1)勃興時期；(2)全盛時期；(3)衰落時期。現在按着順序，把中國出版事業的概況，作極鳥瞰的說明如下。

(A)新書業之勃興 中國新書業的興起，是跟着新文化運動而來的。自從五四運動以後，中國整個社會發生了空前的巨變，尤其是思想界，新思潮的來臨恰如排山倒海一般，專門印行新文化書籍的書店，便應運而生了。最初，那些書店所刊行的，爲標點書，從前的讀書人認爲誨盜誨淫的水滸，紅樓夢，以及大人先生們認爲不值一顧的儒林外史，浮生六記之類，從舊書堆中被找尋出來，穿上時代的新裝出現於讀者面前了。後來標點書愈出愈多，躲在舊書攤的櫃角，被人們

所遺忘了的許多珍本，都被發掘了出來。到後來這些材料漸漸的感到缺乏，於是，有幾家書店便轉換目光，從新標點的舊書轉移到新文藝的創作，這個轉變，嚴格的說，纔是真正的出版事業之勃興。

其時，以『語絲派』爲中心的，北京的北新書局，和以『創造社』爲中心的，上海的泰東圖書局，可說是當時的新書業之二大營壘了。北新書局本來就以出版新文化書籍爲旗幟的；至於泰東圖書局，原初不過是售賣『鴛鴦蝴蝶派』或『武俠小說』的小書店，至多是印些新標點的古籍以號召讀者而已，後來招來了一班日本留學生，如郭沫若，成仿吾等組織了一個純文藝的團體——創造社，這纔一躍而成爲新書業的營壘，爲當時智識慾正極旺盛的中國新青年所愛戴。其時除了『語絲派』和創造社之外，在北京有未名社，在上海則有以時事新報的兩個副刊學燈和文學爲陣壘的一班新文藝作家。此外，以商務印書館的小說月報爲機關誌的文學研究會，也是這一時期所產生的。後來時事新報的副刊文學，也歸於文學研究會之下，盤據於商務印書館的禮拜六，紅雜誌等，逐漸被肅清了。那時的創作小說，正適應過渡時代的社會之需要，出版後當然爲多數青年所愛讀，而能風行一時的。如對於封建社會作深刻的諷刺的魯迅的吶喊，

大膽地描寫性愛的郁達夫的沉淪，形式方面既採用文學革命後的白話體，內容方面又是反封建的，反禮教的，很能給予青年讀者以新的，熱烈的刺戟，所以受到當時一般青年狂熱的歡迎。

(B) 出版界之黃金時代 經過五卅慘案的大教訓，青年反帝，反封建的情緒更爲熱烈，革命的意識漸次在每個青年心中擡頭起來了。可是在這嚴重的時期，浪漫和頹廢的色彩，不但沒有因革命思想而消滅，似乎相攜並進，也更加濃厚起來；所以郭沫若的落葉，張資平的飛絮，都銷行達十餘版之多。描寫性愛的郁達夫和描寫三角戀愛的能手張資平等，竟成爲當時中國青年心目中不可磨滅的偶像。這時，革命與戀愛成爲不能分離的東西，大有有革命纔有戀愛，有戀愛纔能革命的氣概。無論什麼創作，只要內容有革命的口號和戀愛的羅曼斯，一出版便有『洛陽紙貴』之嘆，初版兩三千本是閉了眼睛可以不脛而走的。這一個文壇蓬勃的時期，既造成了許多年青的新進作家，又產生了不少出版事業的後起之秀，而這些新的作家和新的書店，大部分皆會萃於上海，於是上海便無形中成爲中國的文化中心了。新書業中資格最老的北新書局，也從古老的北京遷到新興的上海，在北京則僅留一個分局擺擺場面而已。而且借泰東圖書局爲陣營的創造社，也因與泰東的老闆趙南公發生意見，離開泰東而獨立，成立創造社，出版所了。自從

創造社脫離了以後，泰東圖書局便變成了沒有靈魂的殘骸，一天一天消沉下去，雖然一直到現在還保持着，但僅能翻印許多十餘年前的創造社叢書，以一折八扣出賣而已。這時期所產生的小書店，確如雨後的春筍一般，簡直是無從說起，如新宇宙書店、時代書店……等，在這黃金時代的出版界中，雖宛如曇花一現立即消逝，但着實熱鬧了一時。

及至國民革命軍北伐成功，奠都南京以來，社會由極度的動亂又漸漸的趨向安定。許多青年從戰場上歸來，由於實際工作的體驗，知道革命不是專靠一時的熱情所能成事，曉得理論的重要，覺悟革命與戀愛不一定要滾在一處，於是便有許多青年從浪漫的桃色昏夢中驚醒過來，轉向實際的理論的研究。因此，出版事業也隨着讀者的要求而轉變，社會科學的書籍就應着迫切的需要而產生，替代文藝創作占據了出版界的寶座。這正是民國十七八年之間，甚至有專門出版社會科學的書店，如聯合書店，崑崙書店，平凡書店等之出現。

在這出版界的全盛時期，文化中心的上海，除了一九二五年以前唯我獨尊的商務印書館和資格較老堪與商務匹敵的中華書局，以及由北京遷到上海的新書業大本營的北新書局等外，開明書店，神州國光社……等後起的大小書店，竟多至一百餘家，真可謂極一時之盛況的了。

那麼，這種盛況爲什麼不能持久，不到三五年間又循向衰落的途徑了呢？

(C) 出版事業之衰落 正如俗語所云「好景不常」，出版界的黃金時代僅有數年的時日，却漸漸的衰落下來了。衰落的原因可分爲兩方面說：一方面是應該由作家和書店負責的，蓋自社會科學的書籍風行以來，大多數的書籍都是根據英、日文翻譯而來，重譯本來就有其本身的問題，再加以有許多翻譯家，翻譯的技術既不成熟，甚至有連外國語的程度也很可疑的。這於日文的翻譯爲尤甚，竟有僅學過半年的日文，懂得幾個字母，便靠着日文中的幾個漢字來猜度文意，大膽地逐譯不易應付的巨著，結果只得一句一句照着字典的句語直譯下去，勉強連綴而成，不是錯誤連篇，就是難澀費解，出書後甚至於有連譯者自己都看不懂的文章出現，所以讀書界對於翻譯書的信仰可謂喪失殆盡了。而且社會科學的書籍雖然出得很多，大部分都是千篇一律，其對象不外乎是大學或中學學生，既無特別的名著堪爲專門學者作參考研究的資料，又無淺近普遍的民衆讀物可以啓發民智，其銷路之日漸狹隘，却是勢所必然的。另一方面，則係讀者購買力的減退，也不得不說是出版界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這種現象自從長江方面發生了大水災以來，因經濟的恐慌而更形減削，及至「九一八事變」失去了廣大的東北市場以後，出

版事業已經呈現日暮途窮而窮態畢露了。雖然出版界也會拚命掙扎，或將目光轉向於教科書，參考書，兒童讀物等，或用翻譯年，雜誌年等名詞以刺戟讀者，但終不能衝出這嚴重的不景氣，去年年底有好幾家書店的收賬，甚至不到一成，這是鐵一般的事實，又有什麼辦法呢？那麼，在衰途中，中國出版界的趨向是怎樣的呢？對這一落千丈的出版事業，有沒有採取適當的處置呢？

(D)最近之出版界 近幾年來中國的出版界真是花樣百出，變化無窮，事實上雖然向沒落的深淵一步步沉溺下去，但表面上反而如醉如狂，鬧得蓬蓬勃勃令人莫測高深。茲舉其顯著而可注意的，有下列數點：

**古籍的翻印** 自從民國十一年商務印書館輯印四部叢刊，發行以來頗得社會人士的歡迎，各書業遂相效而起，你來一部四部叢刊，我便來一部四部備要，你來一部二十四史，接着就有二十五史，二十六史的出現，競爭的熱烈確是得未曾有。而最可注意的，是四庫全書的刊印行世一事了。四庫全書可說是中國書籍的寶藏，可是因卷帙繁多，刊行不易，所以僅鈔寫了七部，分藏在北平，瀋陽，杭州等地，後經英法聯軍之役，迭遭兵禍散失泰半，杭州文瀾閣所存者竟成爲僅存

的碩果了。雖曾好幾次倡議影印，終以所費浩繁而未成事實。二十二年，東北淪亡勢及平津，當局因恐罹兵殃，把故宮的古物遷運來滬，而且爲欲使古書流行起見，特選其中重要者數百種，由教育部託國立中央圖書館籌備處與商務印書館訂立合同，印刷出版，於二十二年一月開始工作，選定初集二百三十一種，業於去年（二十四年）內將全書出完了，自經政府這樣一提倡，古書的翻印便更形活躍了。茲將最近五年來所印古書列表如下：

民國二十二年 四部叢刊二一二册（商務）

民國二十二年 重印船山遺書八〇册（太平洋書店）

民國二十三年 四部叢刊續編五〇〇册（商務）影印磧砂版宋經五九二册（上海影印宋版經會）影印各省通志三〇册（商務）宋元明清各醫類案正續二册（上海國醫印書館）影印寫本嘉慶重修一統志二〇〇册，索

引一〇册（商務）

民國二十四年 四庫全書珍本初集二〇〇〇册（商務）叢書集成四〇〇册（商務）影印宛委別藏一五〇册（商務）

四部備要二五〇〇册（中華）二十五史九册（開明）中國文學珍本叢書五〇册（上海雜誌公司）影

印廣勝寺金剛藏經二五五册（上海影印宋版經會）北平三時學會影印指海一六〇册（大東）古今碑

帖集成一五〇種（大東）上海叢故叢書第一集十四種（上海通社）安徽叢書七八册（安徽叢書編印



處)詞話叢編二四冊(南京中國文藝社)劉氏嘉業堂叢書二二〇冊(南潯嘉業藏書樓)惜影樓叢刊

二冊(海風社)六十種曲六〇冊(開明)

民國二五年

四部叢刊三編五〇〇冊(商務)古今圖書集成八〇〇冊(中華)諸子集成八冊(世界)世界文庫二

四冊(生活書店)

此外出版年月未明，或已有計畫而未發行者，如開明書局之二十五史補編，商務印書館之百衲本二十四史，十通，西泠印社之名人書畫全集等，還有好幾種沒有列入。綜觀以上，古書的翻印以二十四年最盛，簡直可稱爲『翻印古書年』了。至於古書的翻印對於讀書界是不是真有實惠呢？這却很可疑了。蓋因這些翻印的古籍，大抵都是洋洋大觀，多則幾百冊，或幾千冊，少者亦有數十冊，十冊以下的絕無僅有，所以定價也當然很貴，而且大部份都是預約，不能零售，每部自七八百元至三五十元不等，絕對沒有十元以下的東西。因此，這些翻印的古籍，僅能作爲要人、豪富書齋中之裝飾品，或公共機關和圖書館的藏書，貧窮的學者或苦學生，連想見面都不是容易的事情。

雜誌的盛行 近年來發刊的大小雜誌，不下數百種之多。除商務印書館的兩大雜誌——

東方雜誌與教育雜誌外，新中華，中華教育界，申報月刊，文學等，都是後起之秀，其他如生活書店的世界知識，開明書局的中學生和新少年，則以高級和初級中學的學生及一般民衆爲對象，倒是很切需要的。至於一般文藝刊物，出版尤夥，紛紛誕生，前仆後繼，有如狂潮的奔湧。就中如時代圖書公司出版的論語，良友圖書公司出版的人間世，則以幽默的作品爲中心，專門提倡小品文爲職志，在文壇上掀起了很大的波瀾。此外如以外國文學的翻譯爲主的譯文，掲載純文藝的作家，及專門研究日本與蘇聯的日本評論及蘇俄評論等，真是五光十色令人目眩。據人文月刊所收近三年的統計，民國二十一年有八七七種，二十二年爲一七二四種，二十三年爲二〇八六種。現在依其性質區分，將二十一年度的雜誌類別列表如下：

雜誌類別	種數	雜誌類別	種數	雜誌類別	種數
綜合	一四二	醫藥衛生	三四	國際外交	一九
學術、史地、該學	一〇七	交通、工程、建設	三二	兒童讀物	一八
藝術、文學	八六	農業	二九	青年讀物	一四
經濟、金融、商業	八三	工業電業	二八	婦女讀物	一二
政治社會	八二	圖書出版	二六	法律	一一
教育體育	六九	美術攝影	二五	宗教	三
自然科學	三五	軍事警察	二一		

由這表上的數字觀察，我們可以曉得綜合類雜誌的數目最多，約占雜誌總數的六分之一，可見純雜誌性之雜誌，在雜誌界中到底占有主要的地位。至於學術、史地、該學類的雜誌，在右表上雖占第二位，但如從其中除去了若干學校的校刊，其數字實與藝術、文學類、經濟、金融、商業類、政治、社會類相埒，四類合計約佔雜誌總數的八分之三，幾相當其半數，在綜合類以下各居次要地位。再次為教育、體育類，幾達七十種，也有相當地位；其他十四類合計，也不過僅及總數的三分之一而已。由此可見讀者的趣味所在，同時亦可表示雜誌界的集中傾向。

其次，再就雜誌之地理的分佈而言，當然也與其他一般出版物無異，是集中於都市的；尤其

地名	數目	地名	數目	地名	數目	地名	數目
上海市	三〇五	青島市	五	江蘇省	三四	湖北省	二
南京市	一五四	廈門	三	浙江省	九	江西省	八
北平市	八四	香港	三	安徽省	六	四川省	五
天津市	二八	青海	二	河北省	四	廣東省	一
武漢	二〇	綏遠	一	山東省	六	廣西省	八
廣州市	二三	日本	二	山西省	一二	雲南省	三
杭州市	三八	暹羅	一	河南省	一〇	貴州省	一
哈爾濱	一	不詳	八	湖南省	六	陝西省	三

是文化中心的上海，同時也是雜誌界的中心，掌握着全國雜誌的半數以上。茲將二十一年度雜誌之分布情況，地理的地分類如上表，以資讀者的參考罷。

綜觀上表，集中於各大都市的雜誌，佔全國總數的六分之五，而僅有六分之一散於各地。上海的雜誌佔全國總數之半，南京次之，約佔五分之一，北平更次之，約佔十分之一。再就省份觀察之，浙江包括杭州，廣東包括廣州，河北包括天津，山東包括青島，則主要省份之次序，應為浙江，江蘇，河北，廣東，山西，山東，河南等；江蘇在雜誌界佔有相當地位，蓋以江蘇包括鎮江，無錫等地，而且與首都的興起有着連帶的關係罷。

雜誌每年創刊約有一二百種，發展最迅速者為經濟、金融、商業等部門。可是，雜誌的發展雖然迅速，壽命則大都很短，歷史在二年以下者佔總數的三分之二，有五年以上之歷史者僅八分之一而已。由此，我們可以知道雜誌在中國的發展是此起彼伏，形成波狀而伸長，不是一直線的。這一方面在雜誌的盛行中反映着不安的狀況，一方面又表示着讀書界的動亂。

### 叢書與文庫

商務印書館編印萬有文庫，自從第一集出版以來，頗得讀者的歡迎，遂風行於全國。後來又續編第二集，內容包括國學基本叢書，現代問題叢書，自然科學小叢書及漢譯名

著等，共有七百種二千冊之多，預定於本年度將全書出齊。此外，尚有小學生文庫、幼童文庫、大學叢書及叢書集成，有的已經陸續出書，有的正在編印中。其次中華書局也有中華百科叢書、初中學生文庫、小朋友文庫、新文化叢書等，不下十餘種。其他如開明書店的中學生叢書、女子書店的女子文庫、良友圖書公司的文學叢書及中國新文學大系等，都是有系統的叢書，皆應叢書的盛行而出現的。又各學術團體，如中華學藝社、日本評論社等，也都有叢書的編輯，委託書店代為發行。至於應時代的需要而起的『國防叢書』之類，更多至不遑一一枚舉。

**年鑑的編印** 年鑑是用科學的方法統計一年間所發生的事件，所以歐美各國對於任何方面都有統計，而有年鑑之編纂，獨我國無之。民國十三年，商務印書館始印第一回的中國年鑑，但僅出一冊，後來便停止了。直至最近，始痛感年鑑的重要，政府機關和書店出版年鑑之風漸盛，廿三年和廿四年出版的年鑑共計十餘種，如本年度出版的申報年鑑與生活書店的生活年鑑，是綜合的東西，對各方面都有統計，很切實用。此外財政年鑑、中國經濟年鑑、軍備年鑑、鐵道年鑑、勞動年鑑……等分門別類的年鑑，對於各該方面的研究可資參考，可為專門學者之贊助。

以上把中國出版界的近況作了一個概括的敘述，最值得注意的活動，就是(1)翻印古書，(2)

雜誌的激增，(3)叢書文庫的盛行，(4)編印年鑑等四點。「翻印古書」原不是什麼壞的事情，可是由此却充分地表示着著作界創作力的消退，和出版界出版力的薄弱。自從不景氣襲擊整個社會以來，出版界因現金的匱乏，經濟上周轉不靈，便不得不想補救的方法。翻印古書，向古人去追求其沾溉，既不需要稿費，又可以用預約的辦法向讀者吸收一批現金來救濟自己的危機，於是古人的寶藏，不兩年間竟被這些聰明的出版業者搜括殆盡了；這是不是正常的好現象呢？在此災難頻仍，民氣消沉的現狀之下，我們祇向古書中討生活，絕對沒有推闡新文化的刺激，就可以滿足了嗎？聰穎的讀者，是不難推想到這個結果的。其次，雜誌的興起固然可以供給讀者以許多『新智識』，多少可以衝破古老氣息，但由此亦可以表示讀者社會的購買力薄弱，而且使讀者漸漸厭長篇巨著，養成他們但圖便捷簡短的材料，也是一件不容掩飾的事實。至於出版界因雜誌的定價較普通書籍低廉，單行本的銷路無形中受其打擊，還是其次的問題。

## 2. 中國新聞事業之史的進展

中國新聞紙的發展，可分作三個階段：一、官報時期；二、教會報時期；三、中國報勃興時期。現在

把這四期的報紙之演進，分別敘述於下：

**官報時期** 官報始於邸報，興於漢唐。唐開元年間有一種開元雜報出版，是唐人的雕本，每頁十三行，每行十五字，字大如錢，內容則刊載開元政事，名爲『邸報』。這邸報就是當時的官報，蓋因唐朝充地方長官的十六節度使之私邸均置於首都長安，所以發行邸報，把私邸的主要事務通報給各自的藩鎮，作爲藩邸的通報機關。因此邸報之任務，是以皇室的狀況，詔令，奏章，敘任，辭令，謁見，朝覲，賞卹，廟堂會議等事及關於藩邸的私事爲主；發行的次數則無定期，是適應必要就發行的。及至元朝以後，乃由無定期改爲旬刊了。

滿清時代更名『京報』，改用銅活字，部數之多少得隨需要而自由增減，遂普及到政府以外的學者，地方官，大商人等，有關於政治智識的各方面去了。光緒年間，又有諭摺彙存，閣鈔彙編，邸報全覽，上諭奏摺等印行，係彙京報材料而成，裝訂印刷都較前精緻。鉛印興行後，京報改由北洋書局，京華書局印售。光緒二十一年，官紳設強學書局講求時務，發行中外紀聞，旋遭封禁。翌年，清廷准御史胡孚宸奏請，改歸官辦，除印行新書外，又刊行官書局報及官書局彙報，內容於摺片摘要外，刊載『路透電新聞紙』西國近事，一次載本局新聞；各種外國新聞，較前完備多了。光緒三

十二年，預備立憲，發行政治官報，內容有宮門鈔，諭旨，事由單，摺奏類，廣告等。宣統三年內閣成立，又改爲內閣官報。同時，直隸總督袁世凱有北洋官報之刊行，爲直隸省的新政機關。各省相起仿效，復有南洋官報，安徽官報，湖北官報等之印行。各部署也因政務日繁，復有商務官報，學務官報之刊行，其內容爲論說，譯稿，公牘，法律，章程，調查，報告，事件，紀事諸類。官報至此，乃極一時之盛。

官報的昌盛，對於人民可說毫無裨益。蓋官報紀錄成文，止於朝政，無評論，無訪稿，無廣告，與今日的所謂報紙完全不同。至於正式民營報紙的創刊，則受西教士所經營的教會刊物之影響甚大。現在把第二時期，教會報的時代敘述於下：

### 教會報時期

京報的特質，乃代表統治階級，是專爲官場說話的；近代報紙的特質，則代表輿論，是爲民衆說話的。所以嚴格的說，邸報一類東西，本來是算不得新聞紙的。因此，我國出版物而近於報紙的，當推西教士所創之察世俗每月統計傳爲嚆矢。該報創於嘉慶乙亥七月，封面右首有『子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右首署『愛漢者纂』字樣，發刊於馬六甲（Malacca），主其事者爲倫敦佈道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所派遣來華傳教的摩立孫（Dr. R. Morrison），1752-1834；他是中國新教傳道的先驅，死於廣東，葬於澳門，及密爾恩（W. C.



Milne, 1785-1822; 死於馬六甲) 與華人梁亞發, 記載以關於宗教事件爲大宗, 餘爲新聞及新學識。該報初印五百冊, 銷售於南洋羣島, 暹羅, 交趾支那各地華僑薈萃之處, 而內地亦時有輸入。這樣一來, 當時就有許多模仿它的報紙出現了。如特選撮要(一八二三年), 天下新聞(一八二八年), 東西洋每月統計傳(一八三三年)等, 皆爲西教士所主持, 尤其是最後一種, 其初發刊於廣州, 與前三種發刊於南洋者不同, 值得吾人的紀念。鴉片戰爭後, 香港割讓與英, 教士來華傳道者益衆, 印刷術也更加完備, 遐邇貫珍(一八五三年), 中外新報(一八五四年), 六合叢談(一八五七年), 中外雜誌(一八六二年)等陸續創刊於香港, 寧波, 上海各地, 其知名者達二三十種之多。

這些教會報初起時大抵爲月刊, 其後乃變成週刊, 日刊, 卽如最初的中文日報『孖刺報』就是咸豐八年(一八五八)將間日刊中外新報改爲日刊者, 可說是日報的鼻祖了。繼之爲近事編錄與華字日報, 上海則有字林洋行之上海新報與滬報, 英國教會牧師麥攸(F. Mayor)所辦的申報, 丹福士的新聞報, 天津有德國人經營的時報, 北京有畢連士的北京日報。然外人在華辦報之目的, 並不是真正爲了我國的文化向上, 無非藉爲傳教、通商之助而已, 其內容除宣教

外，雖也登載自然科學，商業，人物評論及教育的文字以作點綴，但組織均極簡陋，消息亦不確實。

**中國報之動興** 外人所辦的報紙，雖然也有華人服務其間，但主持大計仍舊都是外人。

至於純由國人自己經營的報紙，當以同治十二年，即民國紀元前三十九年艾小梅所發起的昭文日報爲最早。該報創刊於漢口，初爲日刊，後改爲五日刊。繼之，有同治十三年王韜所主辦之循環日報，創刊於香港。次爲新報（光緒二年）及廣報（光緒十二年）。迨中日戰後，國人所受之刺激既深，人民對報紙的需求益切，自從強學會的中外紀聞及強學報出版以來，各地民報便風起雲湧，相繼發刊了。上海有蘇報，警鐘日報，民吁報，天鐸報等，不下四十餘種；北京有京話日報，國民公報，京報，華字彙報等二十餘種；廣州有羊城報，七十二行商報，人權報，光漢報等三十餘種；漢口有中西報，大漢報，湖北日報等十餘種。全國不下百餘家，而且他們都集中觀點，就是抨擊朝政和改革圖強。後來強學會被封，中外紀聞停刊，新會梁啓超南下而創時務報，繼續努力提倡新學，學術刊物，更如雨後春筍怒發，維新運動也頓呈活躍了。爾後時務報又被清廷查封，梁氏被迫出國，但在日本創清議報，庚子後又創新民叢報，光緒三十三年再創政論，然而不幸皆被清政府所封禁了。清廷對於報界，初則以變法圖強之故，力加倡導，後以誹議雜興，時訐當道，則又禁止封閉，然

以時勢所趨，也沒有多大的效果。

及至民國光復以後，政府法律上予人民以「言論出版的自由」報紙彌盛，統計達五百餘種。政治中心的北京，爲數將百，其知名者有共和報、亞細亞日報、大自由報等；上海爲全國商業的中心，除原有的報紙外，新出者有太平洋報、大共和報、民權報等；至於革命軍起義發源地的武漢，崛起者有武昌公報、國民新報、民國日報等，紛起評論國政，可說中國報界的極盛時期。但不幸而國賊袁世凱叛變，釀成二次革命，報紙又遭了一次的劫運，自此以後，袁氏雖被打倒，然不久而有督軍團之禍，張勳復辟之變，廣東護法之亂，再加以無時沒有軍閥的橫行，拘捕記者封閉報館等事，歲有所聞，在數量上中國的新聞事業雖有增無減，但多半懾於權威，模稜兩可。或受津貼，仰人鼻息，以精神言則反而墮落，如光緒時代的氣骨都不可復得了。

## 四 非常時期出版業者應有之態度與決心

以上把出版事業的意義和它偉大的使命，及世界各國出版事業之趨勢與我國出版界之動向，已經有了一個簡單的說明。由上面所羅列的史的進展，我們不難明白出版事業在非常時期應有的態度和今後應有之決心。現在對這兩方面再作短簡的說明，以爲本書的結果罷。

### (一) 非常時期之出版界

出版事業在現社會文化的結構上占着一個重要的地位，所以它不但是單純的一種商業行爲，同時負着文化的重大使命。社會的條件產生着它，它必需適合社會的客觀需要。可是社會的客觀需要並不是一致的，同時經營出版業者又各有其主觀的目的，於是出版界便發生目前這樣雜亂現象了。這種現象的連續，是會阻礙出版事業向前發展的，尤其是在這個急迫的非常時期，出版事業爲了發揮它自己偉大的使命，整個出版界必須有一個合理的制度，大家非以之爲標的而前進不可。於是出版界的統一戰線，讀者、作者、編者的聯繫，就成爲非常時期的出版事

業之最重的一個條件了。

作者所完成的作品，假如不送到雜誌、報紙去發表，或不交給出版事業者手中印刷而成書冊，則僅有他自己一人看到，至多也不過作者的朋友能够鑑賞而已。這樣，不僅辜負了作者的一番苦心，而且也喪失了作品的意義，那麼就得送交雜誌或書店，使作品發表或刊行，而能與多數的讀者見面。這樣一來，却要靠編者的眼光來選擇，評定作品之優劣與需要與否了。所出版的文章，雖然是每個作者自己的產品，但集許多作者的文章編纂而成的雜誌，和決定取捨而後發行的各種書籍，就整個出版界而言，也可說是編者的作品的。編者決定來稿之優劣固然是主觀的，但決定稿件之需要與否，却是客觀的，是基於讀者的，所以維持一個刊物使其存在，則有待於讀者。由此，可知讀者、作者、編者是三位一體的東西，不論在任何地方，任何時候都不可分離。尤其是讀者和出版界的聯絡，換句話說，讀者對於作者與編者是決不能疎遠的；反而言之，作者和編者是應該與讀者常常聯近的。出版界領導讀者，同時也處於被動的地位，隨着讀者的要求而行動。蘇聯作家伊凡諾夫曾說：『我們的讀者是我們的朋友，同時是極嚴肅的批評者；和讀者往來，是我們最好而且最可寶貴的教育。』蘇聯的作家經常接到很多讀者的來信，來信中的大部分，

是關於作品的批評，而且參加許多私人的意見，而大抵的作者，對於這些來信都很重視，常常根據讀者的意見修改自己的作品。通訊之外，他們還可以借用報紙的地位和開會的方式——如『讀者會』之類，溝通讀者和作者，以謀精神的團結。回顧我國的出版界，情形便不同了，作者、讀者儼然形成三個不同的階級，雖然有些雜誌也曾有過所謂『讀者欄』、『編者欄』，但仍不能應用得很好。即使有大膽的讀者同作者探險似的通訊，多數的作者均置之不理，而自絕於讀者。至於編者是更不消說了，去一封信便如石沉大海一樣杳無消息，甚至作者與編者之間也免不了這種不合作的態度。這不得不使我對我們的出版界寒心，尤其是非常時期，出版事業的提攜者是不可不注意的。

其次，出版界最危險的一種現象，便是忘掉了自身的文化任務而完全變成爲謀利的動機，於是迎合讀者低級趣味，欺瞞讀者的耳目，以遂其掠奪讀者金錢的企圖。少數投機份子，際此出版界衰落之時，往往不從正當的途徑謀發展，而專以取巧營利爲事。著者前在上海一個書局任事的時候，曾發見英文編輯主任替書局畫策了一個祕密賺錢的辦法，蒐集各書局出版的世界名著之所有中文譯本，以極低的代價請人對照改竄達原譯本五分之二以上，用惡劣的印刷出

版。近來那一批粗製濫造的改竄本已出現於市上，而且用另一書局的名義在那一個書局貼隣租了一間房子發賣，大概是賺了好一筆錢罷，那位不學無術的英文編輯竟得到書局老闆的垂青，由他的幫助而出洋留學去了。這類偽版書的出現，也許是今日衰落的出版界所應有的現象，然而對於出版界的惡影響却是很大，一方面侵害他人的著作權，一方面用極低價格邀人鈔襲改竄的東西，當然不會有好書，貽害讀者，阻礙文化是罪不容誅的。因此，本年四月七日教育部所頒布的教科圖書及其他圖書劃一出售辦法，實在是很切需要，藉此可以杜絕粗製濫造的一折書，倒是防禦運用卑劣手段以賺錢的出版界叛逆份子之一法。

再次，出版的大衆化，也是非常時期出版事業所應該注意的事情。出版的大衆化可分爲兩方面：即作品的大衆化和書籍的大衆化。前者指內容而言，在文盲領域非常廣大，一般文化水準極低的我國，作品的對象須以多數的民衆爲目標，決不能以少數智識階級爲對象便自形滿足的。尤其在非常時期，一國的軍隊是有形的武力，民衆是無形的武力，到了國家危急存亡的時候，苟欲自衛而應付時局，強化其軍隊固然是目前急務，但組織其民衆，使人民個個都了解時務和自己所處的地位，以爲軍隊的後援，也是不可忽略的急務。如阿比西尼亞之抵抗意軍，自始至終

純恃其前線的軍隊，對於後方民衆不聞有所組織，以致前線失利則後方動搖，一隅潰退則全局瓦解，首都陷落則舉國覆亡，據路透社電謂『城中居民因意軍旦夕將至，多懸白旗以示順從』又謂『暴徒紛起，圍擊各國使館。』蓋白旗之懸，暴徒之起，就是阿國真正失敗之因，而種其因者，實於非常時期缺乏民衆訓練與組織的緣故。『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際此四面楚歌中的我們，豈可不猛省的嗎？而且出版物內容的大衆化，固然非常重要，但在這不景氣喧嚷聲中，書籍的售價若依然昂貴，也是無補於事的，後者即此之謂，非常時期的出版界不可不注意及之，務使定價低廉，人人有購買之力，內容簡易，人人都有盡量接受之力量，才能收得更大的成功，而出版物中之最大衆化者，莫過於新聞紙，下面再關於非常時期的新聞事業略說一說罷。

## (二) 非常時期之新聞事業

新聞紙的任務，是領導着那一個社會的動向的。在社會的立場上說，新聞紙直接的是訓練社會，所以應該指導與批評；間接的是聯繫社會各部分，所以應該介紹與寫實。同時，就國家的立場上說，新聞紙直接的是監督政府怎樣運用權衡，所以應該檢討政府的政策，揭破官僚的黑幕；



間接的是人民的發言機關，所以應該盡量容納人民的意見，爲人民而說話。因此，新聞紙不是從事新聞事業者的私產，是屬於大眾的，由這意味，新聞紙是出版事業中最大眾化的出版物。當這國際環境緊張，全世界轉向於非常時期的時候，新聞紙的責任是多麼重大呀。一方面它須喚起民族意識，指示大眾以一條出路；一方面要分析當前的危機，揭破帝國主義者們的陰謀。所以在這緊張的局面中，新聞事業似乎不應該只是爲新聞事業而新聞事業，而要負起更重大的任務。試觀世界各國新聞事業的集團，各做他們政府行動的先聲與後援，是怎樣的努力呢？英國的路透社，宣傳英政府的殖民地政策；法國的哈瓦斯社，則擁護法蘇協定的成立；德國的海洋社，則幫助希特勒鼓吹萊茵區域的進兵。此外，如日聯社，電通社之在日本，爲日本對華政策的急先鋒；塔斯社之在蘇聯，爲蘇維埃宣傳的工具。由此，我們可以知道各國的新聞事業，在非常時期是取怎樣的行動了罷。他們決不以感情和少數人的利害而轉移，而作盲目的攻擊，也不曲意迎合讀者，做營業上投機的出路。中國的新聞界，處在目前這樣非常時期的尖端上，更應該站在民衆代言者的地位，對現政府加以善意的監督，對於政府的主張予以擴大宣傳，喚醒全國強烈的，統一民族意識，積極建立一般人的心理國防，才算得是一個強有力的鐵甲車，而完成它大眾化的出版

物之偉大使命了。

非常時期之出版事業終